

彼岸

2019年第2期（总第2期）

编者按	2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4
资本主义、苏联问题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	19
从《共产党宣言》到十月革命	53
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	69
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89

编者按

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列毛左派的斗争正在曲折中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目前仍然处于危机前的正常发展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表面上仍然巩固，这决定了马列毛左派所面临的困难和各种斗争暂时失败的可能性。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国家的特殊矛盾，又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必然性以及未来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在未来的斗争中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代表。要在未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合格的政治代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有必要首先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并正确地认识未来由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需要的历史条件。

在“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一文中，作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是说，只要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不可能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过去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中长期得不到重视，甚至不为人所知。从这个观点出发，苏联和中国在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仍然是阶级社会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基本观点，也就不可能在将来正确地解决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苏联问题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一文中，作者探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并提出了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其实质是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作者还就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在近代形成的历史性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非传统的观点。

“从《共产党宣言》到十月革命”、“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三篇文章是作者 2015 年秋季给国内某进步青年小组所做的一组系列讲座中三次讲座的记录稿。在这三篇文章中，作者重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并探讨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与中国历次重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2018年12月)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广义的“马列毛左派”的发展。

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首先是表现为数量的增长（目前全国无产阶级的总数约为2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约四分之一），又表现为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增强，表现为无产阶级斗争数量的增加，表现为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发生了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

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中国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目前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但是，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增强，是曾经反复出现过的现象。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资本主义出现重大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先兆，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革命形势的必要条件。但是，以往，在其他国家，这种不稳定和危机最终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要发生革命，其基本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到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容纳的限度，在经济上表现为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并通过经济危机（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也不是单纯由于债务、泡沫、需求下降引起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危机，不经过革命或重大制度调整无法克服的危机）与持续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从而决定性地削弱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我们在现阶段的理论任务，是努力了解中国未来革命形势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及历史规律，了解未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了解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与无产阶级有机结合的政治力量，但是是一支在政治和思想上十分活跃的力量。就其阶级基础来说，在前期（2000-2012年），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原国营企业反私有化斗争积极分子（“老工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原官僚特权集团中被排挤出来的部分（“老左派”）、原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基本属于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半无产阶级）。2012年以来，激进的大学青年社团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小组已经成为“马列毛左派”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说明在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趋势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正在成为“马列毛左派”最新的、增长最快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没有公认的、统一的理论和行动指南，带着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天生缺陷，在政治作风上充满着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理论上和哲学上则往往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俘虏，各种错误思潮流行。这些缺点，是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尚未真正与无产阶级结合、中国革命形势尚未高涨之前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要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宗派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做斗争，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宣传并扩大正确思想在左派队伍中的影响，逐步形成符合当前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新时代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为未来的大革命做思想上初步的准备。

在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质，正确地总结毛主席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又为什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里还是沿用“复辟”这个说法）。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但不是必然性）。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即被“走资派”篡夺），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至于为什么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会上台，文革理论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思想、文化、习惯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党内的反映。这一套对修正主义上台及资本主义复辟的认识，目前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所接受的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上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这一套理论的实质，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群众或奴隶创造历史。这一套理论，回避了“修正主义”赖以产生并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无论是旧剥削阶级的影响还是小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不能解释“修正主义”为什么会成为革命党内不是某种个别倾向，而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占优势的力量。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修正主义”上台，没有遭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坚决反抗。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新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马上陷入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而是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为顺利地发展。

这一套理论的产生，在当时有不得已的地方，即毛泽东及其同志们无法直接面对新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已经形成并占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事实（不是思想感情上无法直接面对，而是政治现实中无法直接面对）。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一理论仍不加以鉴别和改造，并给予扬弃，就不仅不能指导当前革命的实践，还可能造成相当的危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可能重蹈覆辙，失败或者短命。

要正确地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就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搞清楚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社会，什么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什么是阶级社会在未来走向消亡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是这样总结的：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要“废除阶级”，仅仅“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说，自从阶级社会产生起，自从有压迫和剥削起，劳动者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斗争，为什么在以往都失败了呢？为什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失败了呢？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什么“生产不大发展”就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论述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割裂开来，笼统地讲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把共产主义降低为是要满足人们无限的消费欲望（反过来，只要这种消费欲望还没有满足，共产主义也就不能实现，各种不平等和剥削也就顺理成章）。

什么叫做“生产不大发展”？“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就是说，当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展的时候，社会剩余产品的总量还不够多，因而全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得不把自己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用于生产必需品的劳动（这种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产品占全社会总产品的比例并不低。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地租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往往占到农民收获物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但是，按照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以及按照当时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形式），无论这些剩余产品怎样分配，都不能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普遍大幅度减少的条件。

只要绝大多数人仍然被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体力劳动所束缚着（“完全委身于劳动的” *exclusively bond slaves to labor*），就只能由少数人来“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这些少数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所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说，直接生产劳动与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劳动之间的分工，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但是，“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都不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持久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表面上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上台。但是，“修正主义者”上台只是一定的现实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结果。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导致了“修正主义者”上台而且使其权力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如何利用“狡诈和欺骗”，如何违反公平和正义。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统治阶级就必然要“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从而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所以，只要还没有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只有社会的少数人能够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社会剩余产品就必然为少数人所占有，就必然有压迫、有剥削。

恩格斯在晚年的这些论述，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的。

还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克思在这里讲，只要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就必然要“死灰复燃”。就是说，除非绝大多数人能够从“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中摆脱出来，阶级社会是不可能消灭的，社会分裂为阶级是不可能避免的。

紧接着，马克思又讲了一段话：

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关于“一下子”，英文翻译是：Empirically, communism is only possible as the act of the dominant peoples “all at once” and simultaneously。这一段论述，提出了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在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中，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产生简单说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这一套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在斯大林时期成型，又被中国社会主义继承过来。毛泽东主义者，由于理论的局限，也由于政治现实的限制，只能将“走资派”的产生（实际上即新的剥削阶级，毛主席曾在个别场合用过“官僚主义者阶级”）说成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思想和意识的结果，到了后期，又提出是因为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

配，也包括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差别造成的不平等）只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造成的一部分结果。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阶级社会的一个阶段（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没有超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部分外围半外围国家为了形成现代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可以说，不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还不仅仅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关键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是少数人，而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占有和支配社会剩余产品。

历史上官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的理论局限，又被现在中国的各“马列毛左派”青年小组毫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来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迷”。他们对于历史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重复着前人的错误，将少数个人的历史作用无限夸大，将“走资派”的欺骗和劳动群众的上当受骗当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淖无法自拔。还有一些托派分子，则简单地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形式民主。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基本上完全是由当时社会中主要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来从事的。祭司（僧侣）和军事领袖往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祭司即天主教会（包含了中世纪社会中主要的“知识分子”），国王和各级封建领主即军事领袖。在中国古代，士绅地主阶级既是社会经济剩余的主要占有者，又是脑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形有所不同，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科学研究及其应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和巩

固又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等活动，仅靠占全社会人口 1-2%的统治阶级成员已经完全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脑力劳动的需要。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家阶级本身仍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以外，还需要一个庞大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来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教育、经济管理、行政司法、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工作。其中，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是为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服务。医疗教育是为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服务。经济管理、行政司法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社会科学、人文艺术是为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现代小资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因为他们从事脑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力有一定的垄断性，他们从事的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往往显著高于无产阶级，并且有一定的上升入资本家阶级的机会。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无论是否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都包含一部分剩余价值。

现代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分布，依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大约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 20-25%；在半外围国家，大约占 10-15%；在外围国家，则一般不到 10%。

这种差别，除了反映核心、半外围、外围国家资本家阶级可以与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分享的剩余价值的量依这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有所差别以外，也说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脑力劳动高度集中在主要核心国家，而体力劳动则主要由外围、半外围国家承担。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阶级社会消亡的历史条件又是哪些呢？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是这样讲的：

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说，“阶级的划分 ... 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历史的理由”在英文版中是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就是说，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有根据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恩格斯说：“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

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恩格斯展望了未来无阶级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商品生产的消除、用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来消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灭人对人的统治，消灭人被自然界的统治，实现人们自觉调节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自觉调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的问题是，“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怎样才能消灭“生产的不足”，从而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呢？是不是仅仅是通过“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呢？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阐述，但是结合前面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不难推断出大意。

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所以，“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只有通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才能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而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必须使得绝大多数人不再为直接生产劳动所束缚，从而“社会的共同事务”不再是少数人专门从事的特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普遍地、大幅度地减少绝大多数人的劳动时间，使得他们可以有时间从事各种脑力劳动，有时间参加各种公共性的、创造性的、有利于体力智力发展的活动，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并且从事社会的各种“共同事务”。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48 章中的一大段论述：

我们还看到，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象是自由协商同意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象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

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失；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

【英文版的这两句话译为：“It is one of the civilising aspects of capital that it enforces surplus-labour in a manner and under conditions which are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elements for a new and higher form than under the preceding forms of slavery, serfdom, etc. Thus it gives rise to a stage, on the one hand, in which coercion and monopolis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its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advantages) by one portion of society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are eliminated; on the other hand, it creates the material means and embryonic conditions, making it possible in a higher form of society to combine this surplus-labour with a greater reduction of time devoted to material labour in general”；其中“on the one hand”之前的 it，和“on the other hand”之后的 it，实际上指的都是“资本”而不是“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在这里说，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将“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自由王国”才真正开始了，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

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已经终止以后，从而“劳动”不过是人们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体力和智力充分自由发展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

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创造条件；这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并且会大大超过人们的物质需要提高的程度，从而能够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从而全体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能够参与管理“社会的共同事务”，这样才能造成阶级社会消亡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认识，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决定了全球物质消费的上限。未来建设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斗争，只能在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要求的范围内，在限定全球物质消费总量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缩短劳动时间来实现。

那么，历史上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无阶级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呢？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生产方式（哪怕是过渡性的）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一部分？

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来自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又指出，苏维埃政权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但是那时还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说法；毛主席在非正式场合说过，马克思、列宁都不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到了后来，只有“一国”，怎么办）。马克思、列宁都指出过，在这个“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还会有“资产阶级法

权”，还会有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但是，绝不是说，这个“初级阶段”还要分裂为阶级；绝不是说，社会剩余产品由少数人控制；绝不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不但没有逐步消亡，反而巩固和扩大；绝不是说，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而且绝大多数人仍然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束缚于直接生产劳动中。

而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虽然形式上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广大劳动群众不掌握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和使用。社会剩余产品事实上由占整个社会少数的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有同志可能会说，当时的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的。但是，首先，当时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没有有效地监督和替换官僚的办法。连形式民主都不具备，中国也没有经历过短暂的苏维埃民主的时期。客观上，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官僚物质特权。从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来看，早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中上层官僚已经腐化变质，可以为了个人政治算计而不顾人民死活。在文革前，毛主席曾经说，三分之一的各级党和政府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实际上大大低估。从后来的实际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没有受到大的反对。包括陈云集团，与邓小平争夺的只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办法及主导权而已。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特权集团并且控制党和国家权力的大部分（毛主席基本被架空，只能依靠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系统来平衡党政官僚系统的影响）。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就其独占剩余产品的支配来说，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剥削阶级；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仍然是阶级社会。但是就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的历史过渡性来说（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是作为未来巩固的资产阶级的前身），可以不称其为阶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中国，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核心国家水平，建国初期绝大多数人口尚为文盲，完全不具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条件。只要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社

会划分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就不可避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不是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

那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社会呢？过去，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有“国家社会主义”说，有“国家资本主义”说，有“退化的工人国家”说。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归根结底，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形态，那么，它有没有历史的进步性呢，有没有历史上存在的根据呢，还是如污蔑社会主义的人所说，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漫长、最痛苦的道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性质又是怎样的呢？

资本主义、苏联问题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 (2019年1月)

按照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划分时代标准，中国历史的“近代”开始于1840年，结束于1919年；中国历史的“现代”开始于1919年。这一时代划分标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沿用至今。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我们目前仍生活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既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各个阶级社会，也还没有达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就世界历史来说，所谓“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至于“近代”，则是特指“现代”的某一个较早的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开始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是没有争议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因为在那一年，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这样一种划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无可厚非。当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不久，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开始。但是，自那时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资本主义复辟完成了。中国的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条件下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并且要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

从今天的观点看，从1840年至1949年的整个时期，应当视为中国历史的“近代”，即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外围国家、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内外反动派而开展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时期。按照传统理论，这个时期是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别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为了正确理解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并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雇佣劳动或者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剩余价值而生产（或者，为利润而生产，这一点又隐含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统治地位，即所谓“市场经济”）。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时还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又引出什么是“生产方式”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另外一种说法，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和，而后者又是否有科学意义等。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生产方式”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对于我们在今天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出阶级分析并形成阶级斗争的正确策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了解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和历史过程、区别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区别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又有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早已形成并且已经取得全球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但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不算为剥削阶级个人服务的各种仆役、封建半封建条件下的雇农和长工等）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以外几乎不存在；即使在西欧，也仅仅在英国、荷兰等少数国家占人口多数。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不可能超过 5%。尽管如此，没有人怀疑，在十九世纪中期，世界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在全球范围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规律。

即使今天，全世界劳动力队伍中仍有 30%在从事农业，全球人口中大约 40%生活在农村。在农村的劳动力，绝大部分不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谋生的。在城市人口中，除了雇佣劳动力外，有一些是资本家，还有相当数量的小商品生产者（“个体户”）和失业半失业者。所以，世界范围的雇佣劳动者

大约也就占全世界劳动力总数的 40%。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现代小资产阶级（形式上是雇佣劳动者，但实际上其劳动力再生产有一定垄断性并从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有重要作用的一些职能的高技能劳动力）。这样算下来，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化雇佣劳动者的总数不会超过全世界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据此提出，当今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或者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或者资本主义还没有在全球占统治地位，那显然是荒谬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比如，如何认识十九世纪美国的奴隶制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还是其他什么经济？近代美国的奴隶制与古代罗马的奴隶制是不是一回事，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如何认识近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广泛存在的种植园经济？种植园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是封建的生产关系甚至奴隶制生产关系？如何认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国家所有制的企业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国有制的比例大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算“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

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

我们在探讨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时，有一点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产品又表现为剩余价值（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统治地位的结果；所谓“价值”即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就是说，可以普遍交换的人类劳动），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资本家阶级用于资本积累或者说扩大再生产。所以，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或者说，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本质特点。

（从统计上看，即使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多数情况下，资本家阶级也没有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用于资本积累。即使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年代”，即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中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的部分，通常也只有剩余价值总量的三分之一；倒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才实现了将绝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理想”。）

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实现这样的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需要两方面的历史条件。首先，国家与货币资本持有者之间的关系要发生对于货币资本持有者来说相对有利的变化，从而使得货币资本的持有者有足够的动力将货币投入“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的反复循环；一旦这种循环成为普遍现象，竞争的压力便会迫使大多数乃至全部的货币资本持有者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货币资本投入从货币到商品再到更多货币的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商品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使得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规律。

但是，资本主义要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并且要在全球占统治地位，仅仅有上述一个方面的条件还不够。在资本主义以前，在世界各个地方，也曾经反复发生过人口和物质生产长时期、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但是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而终止了，并且在扩张后往往都发生了大幅度倒退。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各个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能源方面都高度依赖各种传统的可再生能源（人力、畜力、木材、动物粪便、天然风力、天然水力等），而可再生能源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理范围内可以获得的量是有限的。只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使用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以后，才使得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得以充分起作用并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从物理学上说，化石燃料实际上是在亿万年间积累起来的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能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时代集中大量使用，从而造成了世界物质生产得以在一两个世纪内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物质基础。但是，化石燃料是不可再生资源，化石燃料的

使用又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在未来有可能导致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

现在回到资本积累无限扩大趋势所需要的第一个方面的条件。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规律，一个基本前提是，国家要允许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占有社会剩余产品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并且为货币资本的积累提供保护和便利（比如，维护私人资本家的“产权”、支持其对外侵略扩张）。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于货币资本所有者往往十分强大，并且往往对货币资本的积累实行各种各样的限制，货币资本所有者的生命和“产权”也没有切实的保障。

在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剩余产品一般是在各种形式的土地所有者（如奴隶主、农奴主、一般意义上靠地租剥削的地主等）、货币资本所有者（将货币投入商业资本积累或者借贷来牟利的早期资本家）、国家之间来分配的。国家除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压迫各劳动阶级的工具之外，也承担一定的公共职能，如兴修水利、维护仓储；作为农耕文明的国家，还承担有保护农耕文明、抵抗游牧民族入侵的职能。

自从有了私有制以后，商品交换也就随之产生了。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是为了劳动者自身使用以及剥削阶级的使用而生产的，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仅占前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的一少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就产生了。早期的商业资本积累主要是利用在不同地区之间由于生产条件不同而造成的商品价值之间的差异来谋取利润。比如，中原地区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较少，因而价值较低，但是在草原地区价值却较高；而马的生产在草原地区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较少，价值较低，而在中原地区价值却较高。如果商人用黄金在草原地区买马，在中原地区卖掉，换得粮食，再卖到草原地区，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更多的黄金。当货币取得了商品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以后，对货币的占有便逐渐成为对社会财富占有的一种

重要象征（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是唯一的象征）。为了消费更多的商品，土地所有者乃至国家都会产生借贷的需要，借贷资本也就应运而生了。借贷资本的积累方式是，货币资本所有者通过在一定时期内让渡货币的使用权来换取借贷者在一定时期以后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承诺，实际即取得对社会剩余产品一部分的支配权。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一个“世界体系”指的是在广大的地理区域内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这个地理区域的人们往往属于多个不同的“文化”，有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但是他们属于同一个分工体系，因为他们相互之间交换必需品，因而一个体系内某一个地区的人们至少要从同一个体系的另外一些地区获得某些必需品才能维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常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体系”之间也存在着贸易，但是，跨“世界体系”的贸易（比如，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属于奢侈品的远距离贸易。

这样的“世界体系”也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是一种特定的“文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比较发达的“世界体系”或者比较“伟大”的“文明”往往在政治上采取中央集权帝国的形式，比如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亚地区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中国古代各王朝等。在中央集权帝国的条件下，国家相对于私人的货币资本所有者是十分强大的，因而有能力限制货币资本积累的活动，表现为国家可以向商人和借贷资本家征收重税、剥夺其一部分财产乃至有时剥夺他们的生命。为了防止货币资本所有者积累起过多的财富并运用这些财富来攫取权力、破坏现存社会秩序，前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意愿来限制货币资本积累的程度。此外，在古代，社会物质生产主要依靠农业。在化石燃料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下，任何资本积累扩大的趋势实际上都是不能持久的。通过限制货币资本积累的扩张以及伴随货币资本积累扩张而产生的商品消费的扩张，前资本主义国家在客观上起着维护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农耕文明物质基础的作用。在中国古代，这集中表现为历代统治者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古代的人们当然不可能从科学角

度自觉地认识到生态可持续性的规律。但是，人们从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中认识到，对资源的过度采伐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这种认识，又通过宗教、迷信等方式流传下来。比如，认为森林、矿产都包含“天地灵气”，不得随便开采，否则就会触怒天神等。佛教的所谓“不杀生”，大约也与此有关。）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

按照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社会发展史”，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类社会在原则上都要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初级阶段）五个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五阶段发展论”是不符合世界历史实际的。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史学界有争议。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又有很大不同。过去，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史学界有所谓“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争议（教科书中采用的是郭沫若提出的战国封建说）。最主要的，按照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情况，如果没有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式封建社会或迟或早也会发展为资本主义。传统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明朝末年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朝乃至更早的时期，都曾经反复出现过。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与世界各个地方前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货币资本有本质区别或者必然可以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与欧亚大陆其他伟大的古代文明相比（所谓“伟大”的古代文明，指的是有大量经济剩余的农耕文明），西欧历史的特殊性是，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没有重新形成新的中央集权帝国。在公元五世纪至十世纪之间，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庄园经济。在国王、大小封建领

主、庄园之间不存在稳定和明确的统治关系，只存在随着战争、联姻等因素不断变化的依附关系。各个封建王国、公国都没有确定的领土和人口。

在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三田制代替两田制），西欧的农业产量、人口、贸易、手工业生产都有很大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和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封建领主购买奢侈品和手工业产品的愿望，封建领主对货币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很多封建庄园开始废弃劳役地租，代之以货币地租，庄园制经济开始瓦解。

到了十四、十五世纪，西欧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极限。由于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加，欧洲的森林覆盖率由五世纪的约 95% 下降到十六世纪的 20%，因而出现了普遍的木材短缺，而木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燃料。欧洲本地的贵金属生产陷入停滞，限制了货币和贸易的增长。十四世纪，黑死病爆发，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普遍上升。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并恢复地租水平，许多封建领主企图强行恢复劳役地租，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

到了十五世纪，在英、法、西北欧等地方，原来的封建生产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或者自耕农（自己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工具的小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为了进行争夺领土和人口的大规模战争，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普鲁士等逐步发展为有相对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国”，即早期的“民族国家”。与中世纪的封建王国不同，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有比较明确的领土和疆界，有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的人口，在领土范围内有完整和统一的行政机关，有相对强大的王权（路易十四所谓的“朕即国家”）。此外，理想的“民族国家”在领土范围内只有讲单一语言的单一民族。但是，实际上，即使在西欧，也存在着对这种理想“民族国家”的例外（如比利时）。当“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扩大到西欧以外时，形成了各种各样复杂的局面，从而在很多现代国家中引起各种“民族问题”。

另一方面，与欧亚大陆历史上存在的各个中央集权帝国不同，欧洲近代的专制君主国虽然认为“朕即国家”，但是“国家”并非“天下”。中国古代各王朝认为自己是人类文明的代表、文明世界唯一的合法统治者，华夏以内，莫非王土，华夏以外，皆属蛮夷。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陷入了长期持续的相互战争。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领土相近，相互之间的联盟关系又经常发生变化，从而防止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取得压倒优势，因而谁也消灭不了谁，客观上形成了西欧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

这种西欧各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力量均衡”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束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这项条约中，欧洲各君主国相互之间承认彼此在各自领土的范围内拥有“主权”（Sovereignty）。“主权”的拉丁文原意即“至高无上的权力”。此前，虽然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一千多年了，但是在欧洲政治中，罗马帝国的神话仍然存在。在中世纪，如果某个封建王国在短期内一度强大起来，征服了西欧大部分地区，这个王国的君主就可以到罗马，要求教皇加冕，并自称“罗马人的皇帝”。在任何一个时期，至少在基督教世界范围内，只允许有一个合法的“罗马人的皇帝”，即只有一个君主可以拥有基督教世界承认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后来，拿破仑颠覆了这一中世纪“传统”。拿破仑称帝时，不是他本人去罗马，而是迫使教皇去巴黎；举行加冕仪式时，本来应由教皇给拿破仑戴上皇冠，拿破仑一手抓过皇冠自己给自己戴上了。）

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由于各个君主各自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有必要规定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行使的范围，所以就必须确定各国的领土和疆界。又由于每个君主在其领土范围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必须不受侵犯，因而各国的“内政”必须不受外国干涉。因此，各个“民族国家”分别对自己的领土和领土范围内的人口拥有“主权”，主权国家之间互不干

涉内政，便成为近现代国际法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多国竞争的政治局面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在十四世纪开始的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西欧各国长期征战不休。为了进行战争，为了维持和建设强大的陆海军，西欧各国普遍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有的国家还曾经多次宣布“破产”）。为了维持战争和准备战争的费用，为了克服财政危机，西欧各君主国不得不向当时欧洲的货币资本所有者（主要在意大利）大量借债，这便初步造成了货币资本所有者财富和权力增长的条件。为了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来源，西欧各君主国开始鼓励乃至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积累活动，并适应新兴资本家阶级的要求，逐渐形成了各种保护资本家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样，在多个“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局面下，国家与货币资本所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对后者有利的变化，使得后者得以取得社会剩余产品中比较大的一部分，并且其财富和生命都可以得到新兴“民族国家”的保护；而在多国竞争和财政支出的压力下，为了争夺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支持，新兴“民族国家”一般也不敢轻易地危害货币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多个“民族国家”相互之间长期竞争的局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产生并长期存在的一个基本的政治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国家与货币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发生对资本主义积累有利的变化。

但是，仅仅这个条件，还远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发展壮大乃至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西欧开始发端的十五世纪到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十九世纪初，其间还有着漫长的三百年的时间。在十五世纪，西欧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资源约束还没有克服。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外部条件，正在产生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全有可能像欧亚大陆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一些类似体系那样，或者被另外一个帝国征服（欧洲在十六世纪存在着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的危险），或者经过长期征战之后被某一

个王朝统一（曾经同时统治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有这样的野心），或者在战争、农民起义以及生态崩溃中自我毁灭。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巩固

在西欧“民族国家”兴起和相互争战的过程中，统治着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三十年战争后，哈布斯堡王朝放弃西班牙王位，后来成为奥匈帝国的统治者）与意大利北部热那亚的货币资本家结成了联盟关系。热那亚资本家向哈布斯堡王朝提供贷款，哈布斯堡王朝用这些贷款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陆海军，而热那亚资本家则实际上控制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财政。

热那亚资本家得以积累大量货币财富，是因为他们控制了地中海贸易，特别是控制了当时利润率最高的远距离贸易——通往亚洲的贸易。但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以后，于 1453 年灭亡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这样，欧洲经过西亚地区通往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商路变得不安全、利润下降。这就迫使欧洲的君主和货币资本所有者寻找绕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通往亚洲的其他商路。

我们知道，哥伦布至死也没有到达亚洲。但是，哥伦布却为正在兴起中的西欧资本主义“发现”了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而人口又相对稀少的大陆。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在当时，解决了西欧经济发展靠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源约束，确保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工业革命尚未来临之前几百年中的巩固和发展。

从长远来说，美洲为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原料产地和“过剩人口”的移民场所。在十六世纪，美洲对于西欧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了旧大陆原来没有的粮食作物（马铃薯、甜薯、玉米），从而大大提高了每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卡路里供应量，使得西欧经济得以突破原有的生态资源限制，保持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美洲生产的蔗糖，大量输入欧洲以后，进一步改善了欧洲人民的饮食质量，并刺激了茶叶的消费。在美洲开采的金银，输入到

欧洲后，不仅解决了原来制约西欧经济的货币短缺，而且引起了“价格革命”（持久的通货膨胀）。由于实际工资和地租下降，大量财富从工人和地主那里转移到资本家手中。

在十六世纪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包括了三个结构性部分。西北欧地区（包括荷兰、英国、法国北部）通过垄断大西洋贸易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核心国家。原来经济发达的意大利北部逐渐下降到半外围的地位。西班牙在对外战争失败和财政破产以后也下降为半外围。以后的几百年，西班牙、意大利在西欧经济中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东欧出现了农奴制的复辟（史称“第二农奴制”），成为专门为西欧供应农产品的一个外围地区。整个美洲在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下，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为中心地区提供贵金属和原料产品的一个外围地区。

一直到十八世纪以前，西欧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主要集中于与军事直接相关的枪炮制造业和造船业。在当时最主要的制造业部门，纺织业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只能从事“低附加价值”的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像棉纺织品那样的“高技术”产品，西欧还只能从亚洲（特别是印度）进口。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大力发展棉纺织业；但是在工业革命完成以前，英国的棉纺织业必须靠非常高的关税保护才能与进口的印度棉纺织品竞争。随着英国棉纺织业逐渐占领英国本地的市场，英国从印度掠夺来的棉纺织品大部分不再用于在英国市场上销售，而是改用于从非洲部落酋长那里购买奴隶，这些奴隶再卖到美洲，美洲种植园所生产的糖、咖啡和棉花再销售到英国。据印度的进步历史学家估算，英国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掠夺的财富在价值上大约与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所需要的投资资金相当。

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这时，英国不再需要从印度进口棉纺织品，而是需要印度成为英国棉纺织品的一个主要出口市场和棉花原料供应地。这里，对于什么是“出口市场”，需要做一些说明。对于一般的资本家来说，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就是要把这个资本家所拥有的商品

按照价值（或者超出价值的）价格卖出去，以实现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印度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剥削。显而易见，印度人民本身是没有什么购买力的。印度又不是贵金属的重要产地。那么，印度用来购买英国棉纺织品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印度没有“钱”，但是可以生产鸦片，鸦片卖到中国，可以用来交换茶叶、丝绸并有所盈余（表现为中国的白银外流），而茶叶、丝绸卖到英国又可以获得暴利，并且提供印度购买英国棉纺织品所需要的资金。这种英国的棉纺织品、印度的鸦片、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之间的三角贸易，揭示了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国家的一种新的机制。这种剥削不再是采取简单的征服和掠夺的方式，而是开始采取不平等交换的方式。在上述的三角贸易中，英国用近代化工厂生产的包含较少英国工人劳动的棉纺织品可以交换到多出许多倍的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所生产的茶叶和丝绸。

茶叶和丝绸是消费品，其中被工人阶级消费的部分（英国工人阶级消费大量茶叶），构成英国工人阶级生活资料的一部分。通过不平等交换，这部分生活资料变得更加便宜，从而降低了英国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至于被地主阶级消费的茶叶和丝绸，假设地主阶级按价值来支付这些商品，但是英国资本家为了获得茶叶和丝绸实际上仅付出了这些商品价值的一小部分（通过鸦片的媒介，用近代化工业生产的棉纺织品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相交换），这样，地主阶级购买了茶叶和丝绸，就相当于将地主阶级拥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资本家手中。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

如上所述，多国竞争的政治局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来说，多国竞争也有很严重的副作用。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各个“民族国家”长期反复战争，如果不加遏

制，不仅不能刺激资本积累，反而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另一个副作用，是到二十世纪以后才明显表现出来，就是“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过度竞争，会加剧世界经济紧缩的趋势，增加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和长期停滞的危险。

为了克服或者缓解多国竞争所带来的副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需要另外一种政治机制。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是通过霸权国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每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会产生一个相对最强的“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在一定的时期成为“霸权”，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意志强加给其他的“民族国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维护本“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且还维护整个体系的利益。

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个霸权：荷兰联合省、英国和美国。荷兰虽然是十七世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其鼎盛时期比较短暂。到了十九世纪，英国霸权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比较明显了。从 1815 年到 1914 年，欧洲大陆出现了以往几百年不曾有过的所谓“百年和平”。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英国实行了所谓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将自己变为世界各原料出口国的最大市场。英国海军确保了全球各大洋的商业航行自由。

但是，1870 年以后，英国逐渐丧失了世界工业的垄断地位。随着英国霸权的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恢复到了多国激烈竞争的局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开展军备竞赛，一方面加紧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帝国主义时代”

列宁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从原来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剥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为了

争夺商品市场、原材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争夺殖民地。因此，现代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垄断”。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后起的、没有或缺乏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向老牌的、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绝不会自愿放弃已有的殖民地，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导致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又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革命阶级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些，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作为 21 世纪的马列毛主义者，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否还符合当前世界阶级斗争的基本实际？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否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由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有公开存在的殖民地了。当然，核心国家仍然在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方式大量剥削着外围国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为了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而进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上述目的而展开的斗争，是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并非仅仅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才有。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为了上述目的而展开斗争，而且还进行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并进而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大战。

再者，战争的形式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战争的破坏性大大增加，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不再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动员全部人力物力以消灭敌对国全部战争潜力为目的的大国全面战争了。更多的情况，是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特别是美国）侵略中小国家的“局部战争”。在这种新形势下，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不可能发生那种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大战而引起其中某一国爆发革命的情况。因此，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就无法为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任何有用的指南。

从历史上来看，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中，也只有俄国爆发了革命并取得胜利（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下面将继续讨论）。可见，即使在二十世纪初期，“战争引起革命”也不是有普遍意义的。

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来看，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实际上是在英国霸权衰落而美国霸权尚未确立的历史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尖锐化的产物，而并非资本主义最高的或者最后的发展阶段。就这个意义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霸权巩固，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就随之结束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质

沙皇俄国在十七世纪发展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是在现代工业方面，俄国始终落后于西欧。从彼得大帝时期起，俄国的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追求和梦想的，就是怎样赶超西方，让西欧人承认俄国也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梦想，俄国人几度接近，又几度失败。

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一方面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工业化、近代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其内部社会结构又仍然被前资本主义关系所主导：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且几乎全部是文盲；上层守旧势力强大（俄国宫廷中的所谓“斯拉夫派”）；本地工业资本家力量弱小，且依赖外国资本。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初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一小部分人（往往出身于社会上层）就在他们的头脑中集中反映了俄罗斯所面临的这种历史矛盾，并在俄国的历史变革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各阶级均不能发挥的作用。这一小部分人，在俄语中叫做 *intelligentsia*，汉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大约就是经过日语从俄语转译

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半外围条件下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前身。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以后，沙皇俄国被迫进行“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工业化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农奴制改革不彻底，地主阶级和东正教会仍然占有大量土地，农业剩余无法充分动员用于资本积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仍然有大约 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人均卡路里摄取量、预期寿命、识字率等指标与不发达国家相仿；农业产值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能源、冶金等主要工业部门被外资控制；英法资本控制了俄国的银行部门并拥有大量沙俄政府的债券。作为欧亚各民族的“大监狱”，沙皇俄国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被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面临着分崩离析并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一部分的危险。

（在欧洲，如果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意大利东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亚的里雅斯特划一条直线，则这条线以西以北，宗教上以基督教新教为主，语言上以日耳曼语族为主，是欧洲的核心发达地区；这条线以东以南，宗教上以东正教为主，语言上以斯拉夫语族为主，是欧洲的半外围、外围的不发达地区；信奉天主教的拉丁语族国家中，法国在圣彼得堡——的里雅斯特线以西，属于核心国家，意大利在这条线以南，长期属于半外围，西班牙、葡萄牙皆在法国以南，长期属于半外围；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这种分割几百年来没有改变。）

关于俄国革命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其基本历史事实，在国际史学界（无论政治立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了。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马列毛积极分子中，仍然在照搬以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陈述的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我们要进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敢于正确对待以往的历史。对于过去革命历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再采取简单回避的办法了。

在 1903 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就其主要成员来说，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布尔什维克党在形式上又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就其领导成员来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一直到 1917 年以前，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认为，俄国需要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先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才能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这一时期，只有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即认为俄国革命的任务是不间断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先完成一个阶段，再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当时，托洛茨基属于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的小派别。

1917 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党缺乏准备，包括列宁在内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国外。列宁一回到彼得格勒，就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明确提出，俄国革命的任务不是在经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马上要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四月提纲”的实际意义是，列宁明确提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要夺取政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苏维埃的领导权。

对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缺乏思想准备。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在整个人口中占少数（在当时俄国约一亿人口中，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有 400 万），而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是绝对的多数派。但是，在 1917 年公历的 3 月到 11 月的大半年时间中，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形形色色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拒绝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又拒绝满足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以及承认农民自发占领的原教会和逃亡地主土地的合法性），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在短时间内成为对于俄国政局举足轻重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所谓“两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多数派，又利用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机掌握了彼得格勒的武装力

量。11月7日，彼得格勒的工人、革命士兵和革命水兵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中，托洛茨基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这次起义的直接领导人。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仍然决定按照原来临时政府的计划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出乎布尔什维克党的意料，虽然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绝大多数城市工人的支持，但是农民将大多数选票投给了代表富农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左派加起来在立宪会议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席位，而社会革命党右派占了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不得已，苏维埃政府决定解散立宪会议，另外召开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下决心解散立宪会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也暴露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劳动农民中的基础十分薄弱。

本来，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俄国革命的作用是打响欧洲革命的第一枪，用俄国革命来引起欧洲无产阶级的普遍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然后，在“先进”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帮助下，俄国才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残酷的历史现实是，1919年初，德国革命失败了；接下来，在匈牙利等地方的革命也失败了。

苏维埃政权陷入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围攻。在最严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缩小到仅有原沙皇俄国领土的四分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崩溃，加上地主富农的破坏，生活在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在死亡线上挣扎。不得已，只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实际上就是向农民抢粮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俄国曾经出现普遍广泛、生气勃勃的苏维埃民主的局面。但是，严酷战争环境迫使苏维埃政权加强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原来的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被大量抽调到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单位。尽管如此，为了政权运转，还要留用大量旧政府的各级官员、职员和军官，以至于

列宁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实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不仅如此，苏维埃政府还要给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以及资产阶级专家支付高薪，列宁称之为是给资产阶级“交租纳贡”。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经过三年残酷的内战，战前原有的工人阶级（不过 400 万人）或者被抽调、或者失业、或者在战争中牺牲，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到了 1921 年，苏维埃政权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了！但是，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无产阶级，也没有了欧洲革命。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毛主席讲到这段历史时，曾经说，原来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只有一国，怎么办？）

1919 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开始逐步调整并最终放弃了欧洲革命的政策，改为重点支援并领导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按照列宁晚年的指示，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中国促成了国共合作，并支援了中国二十年代的大革命。1922 年，苏联成立（当时只有四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成立后，苏联开始调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二十年代初，苏联首先着手改善与德国的关系。在德国开始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后，苏联政府努力改善与英、法的关系。1934 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任常任理事国。这标志着苏联承认并且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多国体系（1939 年，苏芬战争爆发后，苏联被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开除）。

二十年代初，作为权宜之计，苏维埃政府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实验，即在农村承认和保护土地私有制，开放工农业产品的自由贸易；在城市，除大工业和批发业保持国有外，允许私人资本家进行工商经营活动；国营企业的经营也改为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在列宁的坚持下，苏维埃政府维持了对外贸易国家垄断。这样一套经济政策，在工农业生产关系方面大致上相当于中国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到了 1925 年前后，苏联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是，新资本家（耐普曼）和富农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也膨胀起来，苏

维埃政府内部的特权和腐败也在滋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列宁于 1924 年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党上层卷入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即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政府副总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总书记，执行联共（布）关于世界革命的政策）、斯大林（总书记，主管组织、人事）、布哈林（《真理报》总编辑，号称“党内最大的理论家”）。

列宁去世前，曾经有遗嘱，认为斯大林“太粗暴”，不适合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是，列宁去世后，联共（布）的上述主要领导人共同决定，遗嘱不对外公开。当时，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托洛茨基，免去了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接下来，斯大林又与布哈林结成联盟，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失势后，被迫与托洛茨基结盟，组成“联合反对派”。1927 年，“联合反对派”遭到失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均被开除出党。1929 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

在经济政策方面，当时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随着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苏联经济开始工业化建设，城市人口将要出现大幅度增长，粮食问题变得异常突出。1928 年，苏联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迫使联共（布）领导人下决心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当时苏联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仍占 70% 以上的半工业半农业国，要实现快速工业化，需要同时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农业经济剩余是国民经济储蓄和投资的主要来源。所以，要加速工业化，就必须提高投资水平，而要提高投资水平，就必须将仍然掌握在富农手中的农业经济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第二，工业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因此必须设法大幅度增加给城

市人口的粮食供应。第三，要完成工业化，还必须从国外进口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产品出口还是苏联主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手里还必须掌握充足的农产品用于对外出口。

为了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当时联共（布）领导人分为两派，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战略。这种经济战略方面的分歧，与上述的权力斗争相关但又不完全重合。一派以托洛茨基为首，其经济战略方面的主张则主要依据托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实行“超工业化”。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剪刀差”（即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来攫取农业经济剩余，并用攫取来的剩余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加速完成工业化。

另一派，以布哈林为首。布哈林认为，粮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对农业不利。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零售工业品的价格，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并吸引农民将增加产量中较大的一部分卖给城市。布哈林认为，农民收入增加后，可以扩大工业品的销路，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通过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给城市的数量，不仅可以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还可以有更多的农产品用于出口，从而进口更多的国外机器设备，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工业化。

从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来说，在以化肥农药为基础的“绿色革命”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前，苏联农业不具备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量的条件。有资料表明，当时苏联的粮食单产与北美相同气候条件下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大致相当，因而靠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来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的空间几乎没有。至于说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鼓励农民在粮食产量没有大变化的前提下多卖粮食，也不现实。因为当时苏联农民的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平常的食物消费仅仅勉强维持生存。如果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离开了农村，那么仍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首先会选择多吃。这样，在农民完全

自愿决定农产品销售数量的前提下，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必须以相当大的幅度提高，才可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其实际效果，就是国家不得不用更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同时还要将工业生产的更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这就减少了国家可以掌握的经济剩余，从而不得不降低积累率和投资水平。

在二十年代后期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出于机会主义的需要，先是支持布哈林的政策主张，并借助布哈林的力量打倒了托洛茨基。在托洛茨基被打倒后，面对严酷的经济现实，斯大林认识到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错误的，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实际上采用了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经济政策。

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核心是：第一，实行计划经济，其实际内容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企业不再以盈利为生产目的，而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潜在资源，努力达到并超过国家规定的各项产量指标。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努力实现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并用发展起来的重工业来供给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快速工业化。第三，实行农业集体化，其实际意义是用集体农庄的形式来强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即销售给城市的比率），以服务于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粮食以及农业经济剩余的目的。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利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美欧资本家倾销过剩产品的有利时机，苏联大量进口了一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一度达到了世界机器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苏联的五年计划建设在初期一度遇到严重挫折。由于农民抵制集体化，宰杀牲畜、减少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一度大幅度下降；而国家继续强制征购，因而在乌克兰等部分地区造成了饥荒。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粮食产量恢复并超过了集体化以前的水平。不仅苏联的重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人均卡路里摄取量达到了 3000 左右，接近西欧人民的食物消费水平。

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苏联的社会性质以及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十月革命在形式上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后，也一度出现了带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民主。但是，由于沙皇俄国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无产阶级数量在整个人口中仅占很少比例、帝国主义的包围、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斗争等原因，革命的一代无产阶级在三年内战后已经不复存在。随着苏维埃民主的死亡，苏维埃政权也就从“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演变为脱离无产阶级的新生官僚特权集团的政权。

从苏联二十年代联共（布）上层内部斗争的情况来看，无论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都是这一官僚特权集团的一部分，在国内外重大政策方面没有真正的原则分歧。斯大林后来所选择的对外放弃世界革命（但是支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对内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加速工业化的方针在联共（布）党内有广泛共识，也在事实上符合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需要。这种“社会主义”，其实质，不是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在这种“社会主义”下，官僚特权集团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实际上产生了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苏联社会主义的实际历史作用，是在一个原来由于内外矛盾面临分崩离析并有可能跌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多民族半外围大国中，在旧统治阶级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也无法摆脱由于激烈的资本主义多国竞争和帝国主义大战而引起的危机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充分发动城市工人阶级（并且在 1917 年的关键时刻一度赢得大多数劳动农民的支持），实现了国家重组，并且在这样的国家重组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攫取和动员农业经济剩余完成了加速工业化，从而巩固和加强了苏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大国的地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苏联得以摆脱沙皇俄国时期对英法资本的依赖，并为俄罗斯以外的各民族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带有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毕竟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产物，即使在官僚特权集团已经独占社会剩余产品控制权的条件下，官僚特权集团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仍然受到革命后新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限制，因而苏联内部的阶级关系与发展水平相似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更加有利。

由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相当一个时期实行了支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大大加速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外围、半外围地区的人民做出重大让步，猖獗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主义终于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巨大胜利并没有停止联共（布）党内的权力斗争。1936-1938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别在公开审判、被迫承认自己犯有谋害斯大林和充当帝国主义间谍等罪名后被处死。1940年，斯大林又派遣特务，将当时已经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冰斧杀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标志着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政策。1945年，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签订雅尔塔协定，事实上承认美国在战后的霸权地位，换取美国承认苏联拥有从远东到东欧的势力范围（“从鸭绿江到易北河”）。战后，斯大林先是强令法共和意共解除武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后来又在事实上出卖了希腊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领导希腊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在英帝国主义的军队到来以前已经解放了希腊大部分国土。1944年，英军在雅典登陆，扶植旧国王和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卷土重来。斯大林为了严守与丘吉尔的秘密协定，拒绝帮助希腊共产党而且强令希共解除武装。

1946年，由于不堪希腊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希腊共产党重新开展武装革命，并且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支持下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英帝国主义当时已经无力支持希腊反动当局，于 1947 年撤出希腊。在撤出希腊的同时，英帝国主义求助于美帝国主义。杜鲁门曾经得意洋洋的说：在英国请求我们帮助希腊的那一刻，就把领导世界的工作交给美国了。1949 年，在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希腊革命终于失败。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

按照传统的马列毛主义理论，1840 年以后，中国逐步地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说，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实际上失去了大量领土和主权，被分割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在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中占主要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经济已经不完全是旧式的封建经济了，所以是“半封建”的。

在这样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两者派生的。按照传统理论，这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无论反帝还是反封建，都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在 1919 年以前，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是由农民自发进行的，或者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或改良派领导的，由于农民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然软弱性，都失败了。1919 年以后，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其基本任务仍然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

现在，我们有必要根据以往历史的实际情况来重新梳理这种传统的近代革命理论，以便适应我们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

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传统理论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实际历史进程相对照，有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毫无疑问，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或

者说，从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它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如果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至少在形式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话，中国共产党（即使在革命年代）连在形式上都不能说是个工人政党。党的领导者，主要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出身旧官僚、旧军阀、地主、资本家家庭的；毛主席，实际上是出身于富农家庭；周恩来，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邓小平，出身于地主家庭；朱德、贺龙等，都是军阀出身）。党的基层成员则主要来自劳动农民。

另外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什么革命胜利后，中国并没有去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很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质疑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后者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实际上要提出的问题是，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可不可以说，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际的历史任务，并不是要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要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决定了，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必然要用“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和初步工业化的历史任务？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就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在基本保全中国历史疆域的条件下将原来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帝国改造为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有独立主权的新式“民族国家”。满清统治者以及作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另一方面又绝对不敢动员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从他们的直接经验出发，只能得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来自于武器方面优势的结论（“船坚炮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满清王朝和汉族地主军阀集团开展了以建立近代化陆海军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结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

甲午战败后，清王朝财政破产，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东北、内外蒙、新疆、西藏都有脱离中国的危险。中国已经面临被瓦解、被瓜分的危机。

如上所述，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政治条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由于英国霸权的衰落，这种多国竞争极度尖锐化，并且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多国竞争的尖锐化，集中表现为各大国之间的战争。要进行战争，就需要有强大的军队；但是要进行近代化的战争，还必须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而要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又必须首先进行和完成工业化，而这又要求将现有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充分动员起来从事资本积累。只有能有效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才能巩固原有的“民族国家”并力争改善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凡是不能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都面临被征服、被占领、被瓦解的命运。

据张仲礼研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合白银二十八亿两。其中，所谓“绅士阶级”的收入达到七亿两（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过 8000 万两，其中用于近代海陆军建设的支出每年只有几百万两。中国的经济剩余绝大部分都被地主阶级挥霍了。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政府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政府的形式，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300 亿元（银元或战前法币）。据卡尔·里斯金的研究，当时中国国民收入中，超出劳动者必需消费的经济剩余约为 80 亿元（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强）。但是，经济剩余中，大约有 60 亿元来自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这部分经济剩余，主要被地主阶级挥霍浪

费。来自近代工矿业的经济剩余，仅有 3-4 亿元。当时南京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 5 亿元，绝大部分用于军费、赔款、支付外债本息等；经济剩余中实际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仅有 6 亿元（国民收入的 2%）。

据南开大学近代经济史资料，在 1895-1930 年间，中国支付历次战争赔款约 8 亿两白银，支付外债本息约 12 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汇出利润约 25 亿两白银。以上合计 45 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 20 次《马关条约》赔款或者 10 次《辛丑条约》赔款。上述因赔款、债息、利润支付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 1.25 亿两，大约相当于晚清中国经济规模的 4%；折合银元或法币 1.8 亿元，大约相当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经济规模的 0.6%；与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经济产生的经济剩余相比，则占近代工业经济剩余的约一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两白银约合 0.7 美元或 1.4 银元；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美元约合二两白银或三元法币；按物价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两白银大约可以购买 80 斤大米，到了 1933 年，一块银元大约可以买到 25 斤大米。）

这些资料表明，革命前的中国经济中，虽然有着相当规模的经济剩余，但是这些经济剩余大部分被地主阶级挥霍，而近代经济剩余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帝国主义剥削走了。所以，要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首先就要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而要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就必须一方面消灭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将外国资本从本国市场中驱除出去。

在 1919 年以前，无论是清朝末年形成的军阀官僚集团，还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受了西化教育但是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近代知识分子，都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依附，因而都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1919 年以后，中国的近代革命确实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就其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在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激进化，

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些激进的近代知识分子逐步地认识到，要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充分动员以劳动农民为主的底层劳动群众，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保持密切联系的旧统治集团完全打倒，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展资本积累），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激进民族解放运动。

在1949年革命中所产生的新国家，其实际的历史使命是动员经济剩余、开展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这个新国家又是在充分动员广大底层劳动群众的人民大革命中产生的，因而不能不反映劳动群众的历史性要求和愿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

“中华民族”问题

在上面说到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曾经提及，理想的“民族国家”是由讲单一语言的单一民族构成的。这样的“民族国家”，显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教科书中讲，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另一方面，自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经过重大改造以后，确立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地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中国，在怎样的意义上，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

这里，先要提到“中华民族”的概念。这个概念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晚清首先由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才为人们普遍接受；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又被资产阶级当局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

当孙中山等人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一开始是特指汉民族，比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排斥汉民族以外各少数民族的。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等人所讲的“民族主义”主要不是针对帝国主义，而是为了“排满”。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开始在有些情况下用“中华民族”来泛指中国境内各民族，但是又面临着如何解释“中华”之下各民族之间内在联系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编造了各少数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分支的伪科学理论。由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较少采用“中华民族”这一说法，更常见的是“各民族人民”或者“各民族劳动人民”。只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华民族”以及所谓“民族复兴”、“民族崛起”等才又流行起来。

不仅“中华民族”的概念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使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本身也有一个从前资本主义民族向现代民族演变的过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交通困难，被大山、河流、森林隔绝，集中在某一狭小地区、通过血缘氏族纽带连接起来的部落或者宗族往往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群体。对于一般的劳动者乃至相当一部分地主阶级成员来说，“同村”、“同乡”是他们可以从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用来相互认同或者区别不同群体的主要标准。

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上层，有着比较明确的华夏、蛮夷之分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认为除了“华夏”以外没有其他文明。这种观念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之间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别。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以后，这种夏夷之辨就已经完全不适应近现代的世界形势了。

在西欧，近代民族的形成是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发展同步完成的。在一定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内，由于商品和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形成并且巩固了人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文化。这种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又随

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疆界的确定和近代国民教育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为了反击欧洲反动君主的“反法联盟”、保卫革命成果，革命政府将武装力量的征召范围从少数职业军人、雇佣兵扩大到了所有的成年男性。此后，欧洲各国都建立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制，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共同体”纽带。

中国在近代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外围国家。中国近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西方近代民族的形成有所不同。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观念，首先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产生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初步产生了一批受过近代教育、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即将面临被瓦解、被瓜分，这一危机在中国早期的新式知识分子头脑中引起深刻的反映，并产生了要在尽可能保全中国历史疆域的条件下建设近代独立主权国家的愿望。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在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中，首先形成了所有中国人（汉人）都同属一个民族、有着与“外国”根本不同利益的观念。这种近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但是，到那时为止，这种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劳动群众。只是在经历了近代的历次革命运动以后，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直接投入了普遍的、人民大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从那时起，“中国人”这个概念才在一般的汉族人民群众中被广泛接受，并被看做是比村、乡、省更重要的认同标准。然而，即使到今天，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合法性下降，仍然有大量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加重视地域、血缘关系，而对于国家、公民等观念则十分淡薄。

在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则更为复杂。中国现在的疆域基本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但是清朝仍然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帝国，并非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汉族聚居区（也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

区），清朝政府通过十八行省实行直接的行政管辖。在十八行省中，除了“皇权不下县”以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接近近代“民族国家”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是，在东北（满洲）、内外蒙、新疆等广大地区，清政府仅有微弱的军事和行政力量。满清王朝以东北作为其“龙兴之地”，长期禁止汉族人民进入。在内外蒙和新疆，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依靠当地少数民族上层来统治。随着清朝的衰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终于导致外蒙古独立（这里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沙俄勾结外蒙封建王公进行的“独立”、“自治”活动；至于蒙古人民在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和苏联帮助下打败中国北洋军阀、推翻封建王公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则完全是进步的、正义的）。新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阿古柏入侵后，几乎被分割，经左宗棠率军收复，才得以保留在中国版图中。至于西藏，在二十世纪以前，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虽然接受清朝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并受到清朝在政治上的指导和军事上的保护，但是其宗教与世俗方面的内政几乎完全不受清朝统治者的干预。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藏一度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实际上沦为英帝国主义的保护国（印度独立后，还一度企图继承这种保护关系）。

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巩固地纳入中国版图并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实际上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实现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方的各少数民族，由于与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革命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而拥护并且认同经过各民族人民革命共同创造的“新中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各民族人民以“新中国”作为自己共同祖国的客观历史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个客观历史基础就已经被破坏了。相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压迫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通过民族压迫表现出来，民族压迫又反过来削弱各民族人民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中共

同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就增加了未来中国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从《共产党宣言》到十月革命 (2015年10月)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的法文版是1880年出版的，是《反杜林论》的一部分。当时恩格斯和杜林辩论，其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独立发表，是马恩思想比较成熟的作品。上一次读书会讨论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社会会分为阶级，传统的观点认为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强调形式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大家是受了在中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有一些是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又在很大程度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则又可追溯到第二国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恩晚年比较成熟时期的作品，咱们今天来谈谈马恩青年时期，19世纪中期的时候开始形成的一些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开始投入到运动的时候，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咱们今天来谈谈《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里著名的论断是：资本主义必然造成无产阶级的壮大，而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咱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咱们试图要解决中国社会在当代所面临的进步和变革的问题，争取获得无产阶级的胜利，争取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尚未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在实际上、理论上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加了一个脚注，指出这里应该是指文明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在这里根据自己的世界历史知识，发现以往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导致革命改造还是各阶级同归于尽，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这句话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有没有启发意义？可以考虑。“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可以这么讲，从我们实际了解的，无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分为核心、外围、半外围，还是资本主义体系里面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实际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分裂为两大敌对阶级，实际的阶级结构比马克思设想的要复杂。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这又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下面从美洲发现到资产阶级开发美洲说起，这里涉及到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有一段著名的话“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打。”“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

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这段话很重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概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的概述是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虽然这里的词句和 1859 的导言有一些区别，但是基本的思想，基本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基本的逻辑是：无论是什么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制度，需要依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但是历史条件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一定的社会所依赖的条件，但是一定的条件是会变化的，到一定阶段新的条件会和旧的制度冲突，这种冲突最后只能用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来解决。咱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咱们需要思考它所依赖的存在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会怎么样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资本主义矛盾而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到什么程度就会和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些不可调和的冲突又怎么样通过变革来解决？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初步提出了这些思想。《共产党宣言》是在 1848 年创作，当时欧洲工人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几个国家的一些工人在巴黎组成了正义者同盟，邀请马恩撰写纲领，后来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当时马克思才 30 岁。

在概述了当时所达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后，接下来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是同样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同样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这些历史条件又如何发生变化？“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

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我们先不管这里具体的论述，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假设。

假设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个冲突会越来越激烈，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是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以后会再谈。

假设二：“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谁是无产者呢？“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第二个假设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会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会造成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会不断发展壮大。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在这里有一个想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逐步缩小中间等级的队伍。马克思在这里把农民当做以往中间等级的下层，迟早要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马克思把西欧国家的农民视为一种保守力量，这种情况到列宁有了变化，到了毛主席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更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这里关于中间等级马克思列举了商人，手工业者，但是没有列举知识分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谁是中间等级？他们在革命中起什么作用？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咱们先搁置下来。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阶段，“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有一段论述常常引起很多争执。“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关于这一点，几乎肯定不符合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发展的实际状况，这里关键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是不是必然导致工资降低到同一水平，以及无产阶级内部利益和生活状况是不是必然趋于一致，而是即使不具备这样情况的条件下，是不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就不能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以及力量的对比就不能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在当时是成立的，现在更加成立。“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马克思认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的发展。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

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最后一段，“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如果说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一定意义上正由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我们眼前再现出来，这里相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这些历史条件如何发展变化？发生到什么程度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在这里说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资本积累，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说大多数劳动者成为无产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情况同无论是马克思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还是之后的相比较，并不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果，却在一定地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无产者，但是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发生到什么程度才会和资本主义的积累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这里面一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会壮大，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自相竞争被结社达到的革命联合所代替，这个代替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本身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无产阶级

不仅在数量上可以扩大，而且组织程度也会增加，这是马克思的假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下了一个论断：资本主义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咱们现在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的逻辑、论断和论断的根据概括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是 1848 年，1848 年之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什么？哪些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的论断？哪些是不符合的？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有什么意义？在我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之前，现在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人组织的。马克思的设想，大致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造成无产阶级数量的壮大，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本身带来的新的物质条件比如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进步，必然会带来无产阶级组织的便利。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粗略的历史，1900 年前后，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大概占世界人口的多少比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为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在很长一段时间，核心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5%，半外围再算 15%，这两个加起来算 30%，外围占三分之二。外围在那个时期是绝对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半外围也基本有限。1900 前后无产阶级化基本上仅限于核心范围，如果核心国家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充其量算作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所以二十世纪初，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化程度也就是 10%左右。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整个外围地区，无产阶级化程度仍然很低。比如中国，城市人口很长时间没有超过总人口的 20%。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化主要是在核心国家和传统的半外围国家，所以 1970 年前后大概算到 20%。2010 年前后呢？世界的城市人口前几年刚超过 50%，城市人口里不全是无产阶级，从世界范围来说，无产阶级化也就是 30-35%。从七十年代到现在，世界范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无产阶级化程度大大加强。中国人口大概占世界人口的 20%，现在无产阶级化程度还没有超过 50%或者刚刚超过 50%，算世界人口的

10%，加到七十年代的 20%上，也就是 30%强。从《共产党宣言》以后，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化程度从不到十分之一，扩大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可能与我们直觉上的理解不太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也许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胜利，并不一定要求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达到多数，也许三分之一的无产阶级化就足以达到根本改变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这个地方，无产者组成为政党，是必然趋势吗？

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1864 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在协会成立的宣言里，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个著名的论断。19 世纪后期，欧洲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德国。早在 1863 年，德国工运中的拉萨尔派成立了自己的工人运动组织。1869 年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 年拉萨尔派与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召开了代表大会，后来马克思写过《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不久就受到德意志帝国的镇压，当时的首相俾斯麦，实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禁止社会主义者的集会、结社、组织等。在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反对《非常法》的斗争。1890 年，以俾斯麦下台、《非常法》被废除而告终。1892 年，在爱尔福特的党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纲领。恩格斯去世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出现了强大的修正主义。

取得了合法斗争的条件之后，在合法斗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多次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发展成为最大的党，社会民主党还兴办了各种社会组织，医院，学校，就像咱们以前的国企。随着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扩大，党的领导人

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取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改良的成就不仅是抱有期望，而且也从中获得了好处，这时修正主义势力就滋长。1899年，伯恩斯坦开始公开提出修正主义的理论，当时他的一些论据是：到了19世纪末期，已经和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已经变得更有组织性、计划性，所以经济危机不太严重。另外由于有了卡特尔、托拉斯，资本主义在向计划经济的方向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经济危机，而且可以消灭经济危机。第二：资本主义实际发展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导致中间阶级逐步消亡，他认为当时德国的中间阶级是在不断扩大。第三：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他认为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不断提高。根据上述的三个论断，伯恩斯坦说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暴力革命不再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大家注意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同义语）是在资本主义内不断进行改良，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影响，从而使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这些修正主义观点不符合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理论，但是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同情伯恩斯坦，由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官方理论，他们不好直接表达出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里面最大的党，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主要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1903年，出生于波兰的年轻女性——罗莎·卢森堡，最早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提出批评，当时社会民主党里公认的权威比如考茨基才跟上来进行批评。后来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右派、中派、左派，右派和中派都是修正主义，左派主要是卢森堡和列宁，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在俄国就反映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分裂。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的政党纷纷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绝大多数议员都赞成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预算，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另外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投了反对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这个时候列宁痛定思痛，在流亡期

间，撰写了《帝国主义论》。在这本书中，列宁一方面试图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同时试图说明战争的根源，另外也要说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的观点是：到了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发展阶段。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垄断资本占有大量剩余价值，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加深，从而使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停滞性和腐朽性。这是当时列宁的观察和论断，不一定适合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为了克服这种停滞性和腐朽性，资本主义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资本输出，到国际市场上寻找新的劳动力、原材料、投资场所，为此就要进行资本输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进行资本输出主要就是通过占有殖民地，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占有大量殖民地，而美国德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只占有少量殖民地，这种情况下就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大战。这个论断放到二十一世纪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因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输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殖民地的过程中会获得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就会拿超额利润收买一些本国的工人领袖，从而使这些工人贵族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实际上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认为超额利润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在当时主要是关心在他那个时代革命的问题，他的想法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特别是沙皇俄国，列宁认为是最薄弱环节，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可能首先起来革命，然后再带动欧洲革命，然后再带动世界革命。这个就是二十世纪初期伯恩斯坦与卢森堡、列宁之间的论战。

列宁和伯恩斯坦之间的论战孰是孰非，这个问题不仅要从政治立场去考虑，也要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考虑。历史的实际发展既肯定又否定了列宁和伯恩斯坦

坦。先说伯恩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直接的历史发展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不仅是帝国主义大战，很快是大萧条，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很多问题都暴露无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欧洲来讲，社会民主党影响上升，在若干国家都取得了交替执政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959 年正式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欧洲来讲，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相对的阶级妥协，美国在新政以后也出现了阶级妥协的局面。总的来说，二战以后，在北美和西欧，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开始施行福利国家，工会的作用上升，一度出现社会改良和阶级矛盾缓和。在我读书的时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说法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工人生活水平好了很多，各种矛盾都缓和了。现在工人运动中的自由派、改良派，所梦想的还是实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改良的阶级关系。实际上到七十年代以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出现了新的阶级矛盾激化的局面。

改良主义在欧美的工人运动中流行一时，即使是现在也有一些影响，这个问题的基础是什么？绝不是列宁所说的由于资本输出带来的超额利润所能解释的。无论是从十五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起源阶段，还是现代资本主义来说，由于资本输出所能带来的利润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获得的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真正剥削的大头在其他部分。俄国确实爆发了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怎么存在下去呢？无论是按照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讲，俄国在欧洲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先进工业国的帮助，社会主义革命是进行不下去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开始的希望是俄国革命带动欧洲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然后德国革命胜利以后再帮助俄国。但是德国革命没有成功，1923 年汉堡工人起义失败以后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政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外来说，原来是寄希望于欧洲革命，欧洲革命靠不上，苏维埃政权把重点转移到寄希望于东方，当然这个性质和欧洲的革命是不一样的。

1921年，在巴库召开了东方和殖民地人民的代表大会。列宁曾经提到未来世界前途取决于这样的事实：被帝国主义统治的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有十几亿人口，而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几亿人口。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十几亿人口将要发生什么变化。实际变化呢，从二十年代以后苏联加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苏联实际上处于非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加大和非西方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

内部来讲，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苏维埃民主十分活跃的局面。当时俄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在战前是400万，经过世界大战、革命、内战，第一代无产阶级基本上不复存在。由于实际的经济政治的压力，政治权力逐步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革命初期，工厂普遍存在工人民主的情况，比如有工厂委员会，后来被一长制取代，由工人管理过渡到少数官僚管理。在列宁逝世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十月革命初期，托洛茨基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先是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垮了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打垮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到三十年代又打垮了布哈林。在权力斗争后面要了解当时的实际历史条件。在和托洛茨基斗争的过程中，斯大林第一次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没有的。实际上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已经形成了比较巩固的官僚特权集团，独占政治和经济权力。

苏联算不算社会主义？在什么意义上算？马克思在以往的论述中很少使用社会主义，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面马克思才区别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次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到未来无阶级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还是毛主席期间的中国，都套不上。但是在什么意义上是呢，它们在当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就是旧的统

治阶级无法有效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挑战。从十九世纪以后，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旧的统治集团长期无法解决资本积累、工业化、军事现代化的问题。只有充分把底层调动起来，消灭旧的国家结构，带之以新的国家，才能动员经济剩余进行有效的工业化建设。既然把底层群众动员起来，新的国家就要和已经动员起来的底层群众达成历史妥协。除了许诺未来要逐步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建设共产主义之外，在眼前的经济和社会安排上也要造成对底层群众比较有利的条件，铁饭碗，充分就业，包括一定意义上限制官僚集团的物质特权。所有这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能够造成对劳动群众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

提问

Q: 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能不能解析一下？

A: 从二十世纪的实践来讲，最后肯定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只能在一个或者若干个地理区域取胜。但是如果最后推翻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到无阶级社会，还是要通过由一国到多国，最后到全世界。我们也会在相当程度上遇到这样的挑战，这不等于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是没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发生在俄国和中国，当时的俄国和中国的主要特点是，旧的统治阶级不能解决动员经济剩余进行资本积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底层群众充分动员起来，这样的新的国家除了要进行资本积累以外也要和底层群众达成历史妥协。拿苏联和拉美做比较，也事实上说明苏联与这些地方的人民相比取得了相对好的发展条件。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仍然可能被现在的阶级斗争所继承并且发挥作用。二十一世纪，咱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绝对不是集中一切经济剩余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更不是继续进行工业化，而是要解决二十一世纪

人民的需要和生态可持续问题，这会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建设有根本的区别。

Q: 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革命，内在的不充分？出现革命后的官僚主义问题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A: 就二十世纪来讲，有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和俄国这样起点劳动生产率很低，只有小部分人从事脑力劳动，绝大部分人从事体力劳动就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还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大部分人除了生产自己的必需品之外，还要生产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所以这就更加不可避免。唯一可能的是，开始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能够扩大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Q: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看待农村的分田单干，让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以配合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难道当时的马列主义者就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吗？

A: 原来的毛泽东主义者在当时已经失去势力，有一些自由派当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真正从体制内对分田到户有抵制的，可能在华国锋时期还有一些，后来基本上就没有了。谁是八十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对象就很难界定。八十年代，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党内的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已经有结论。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革命已经转入低潮，欧美学生运动、七十年代智利革命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什么集团在台上，肯定面临的问题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围的情况下如何存活下去。关于这些

问题，党内是存在分歧，包产到户只是一个方面。为什么陈云集团失败，绝不仅仅是他们不精于权术，是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Q：对托派的看法。

A：托洛茨基就算是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他也会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恐怕实际结果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斯大林后来实行的加速工业化，剥夺富农、中农，实际上就是抄袭了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的战略。后来由于当时苏联面临的实际困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增加粮食出口，以增加机器进口。

Q：“对外投资带来的利润只是很小一部分 真正的剥削的大头在其他地方”在哪个地方？

A：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主要是通过赤裸裸的掠夺，十九世纪以后主要是在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价值转移。

Q：托洛茨基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区别？

A：托洛茨基和列宁有渊源，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从理论上来说，托和斯大林各自自称是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反对阶段革命论，比如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区别，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涉及到苏联当时的具体情况，毛主席以前也说过，当时只有一国，不一国怎么办？当时欧洲革命失败是一个现实。托派还有一个观点：斯大林建立的社会

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退化的工人国家，被官僚集团所控制。但是他又不认为苏联是新的阶级社会，因为它的经济基础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但是上层建筑在官僚集团手里。传统的托派还有一个观点：对退化的工人国家所需要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只要改变上层建筑就可以了。咱们知道苏联后来的实际情况既不是社会革命也不是政治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复辟。

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

(2015 年 10 月)

前三次讨论了各种理论问题，也涉及到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概况。在接下来的几次讲座，我们将重点讨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和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探讨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书里，马克思一开始就说这本小册子的每一节都会命名为革命的失败。今天的和下周的讲座也要讲革命的失败。今天讲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革命的失败，下一次讲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讲革命的失败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摸索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进程，从中摸索出未来革命可能产生的条件以及未来革命可能胜利的条件。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在奋斗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完成？在二十一世纪又会在哪里突破？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以及在未来实践中要摸索的问题。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 1848 年，不久就爆发了欧洲革命。从 1848 年欧洲革命到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大约是 70 年时间。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大概是 30 年的时间。在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 30 年时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遇空前危机的时期，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了灭亡的边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会遭遇大的危机呢？概括来说，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所讲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激化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于政府规模很小，国家干预不强，不能够有效地应对矛盾。从 1870 年到 1940 年之间，大约 70 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确实出现了越来越猛烈的趋势。

第二个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之间，原来从 1815 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彻底打败法国以后，英国霸权得以巩固。1815 年到 1914 年之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处在比较巩固的英国霸权之下，当时号称是欧洲的百年和平。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不仅是对霸权国家本身的资产阶级有利，而且霸权国家的存在，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要使它得到控制，不至于破坏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就需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有效地调节这些矛盾，从而能够遏制这些矛盾的发展，保证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英国已经不再能够承担这种职能了，这样就出现了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局面。主要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德国。美国当时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在海军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德国是欧洲大陆上主要的陆军强国。随着英国霸权衰落，就出现了美德争夺世界霸权的局面，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三个方面。在前一个时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空前扩张，取得了全球统治地位，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阶级结构，从而造成了新兴的社会力量。新兴社会力量里面有两大力量，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另一个是非西方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过程中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新式的西化的知识分子，从而在非西方产生了受西方影响的精英集团。这两部分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各种政治经济要求在原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都不能够得到满

足，这样就产生了分别代表两种新兴社会力量的社会运动。在世界体系学说里面，叫做反体系运动。对西方工人阶级来说，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非西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西化知识分子来说，主要是亚非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现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端于西方工人运动中的激进一派，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逐渐演变成了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

经历了这样大的冲击以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巩固。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重组，经过重组以后，上述的各种矛盾得以受到控制，从而重新建立了有利于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条件。这种新的条件最终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得以出现战后二十多年的空前的扩张，资本主义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黄金时期。

在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怎样进行重组的？

这个重组也是分几个方面。首先，世界范围来说，随着美帝霸权的巩固，就出现了新的秩序，结束了美德两强争夺世界霸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前激烈竞争的局面。咱们过去常常说在冷战时期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美国，一个苏联，实际上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相当不平等的，即使在极盛时期，它的经济产值也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实际上是美苏两国，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秩序。通过雅尔塔协定，美国承认苏联从东欧到东亚的一定的势力范围，以此为交换，苏联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在此之前，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斯大林正式向罗斯福表示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

这一方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二战以后，希腊曾经出现很好的革命形势。在二战期间希腊国王逃跑，希腊共产党单独进行了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并且得到了希腊人民拥护。法西斯垮台后，英国护送希腊国王和希腊资产阶

级的军事独裁政府回来接管，遭到希腊共产党和希腊人民反抗。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到 1947 年，希腊共产党又控制了希腊大部分国土，英国的力量眼看就不行了。这个时候，英国迫不得已向美国求援，杜鲁门讲过这样一句话：英国在希腊问题上向美国求援的那一刻，就把领导世界的工作交给我们了。这样美国就承担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领袖的角色。希腊的邻国是保加利亚，与苏联也不远，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坐视不管。雅尔塔协定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秩序。

第二个方面。面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帝国主义也决定作出一定的让步。一个是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在战后美国对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接受亚非各个殖民地的独立。这样原来亚非的各个殖民地在形式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美国许诺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

第三个方面。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整。这一点也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有意识的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地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从而使战前资本主义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往往发生资本家利润减少，利润减少，资本家就减少投资，投资减少利润就进一步减少，往往通过恶性循环发展成大萧条。在实现了积极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后，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战前常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在相当程度上被克服。第二个方面就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的调整，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阶级妥协的局面。一个突出的方面，在西方国家的主要公司和主要工会之间，形成了所谓的“资本劳动谅解”，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大公司利用它们的垄断地位，以及所攫取的垄断利润，可以向工人保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也不断提高，从而使西方的工人阶级可以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利益。作为回报，改

良主义的工会，愿意放弃对资本家管理权的挑战，同时帮助资本家约束工人，这就是资本劳动谅解。除了这个以外，另一个有助于缓解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国家的制度。美国在 30 年代实行的新政，实际上也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形式。福利国家的实质是国家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在传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里，劳动力再生产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家庭自身承担的。但是在福利国家下，资本主义国家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比如教育的社会化、医疗卫生的社会化、养老的社会化，也包括工人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导致工人失业的这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有什么好处？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减轻了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减少了工人阶级因为经济波动而突然陷入贫困和疾病的风险。对于资本家来讲，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能够为资本家提供标准的、质量比较统一的劳动力队伍。通过这样的福利国家，进一步巩固了战后的资本主义秩序。

这几个方面，1945 年以后在美国的霸权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做的调整，这种调整使的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有了新的有利条件。但是在经过了十几年快速的积累以后，战后资本主义秩序很快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虽然刚刚提到的战后资本主义的调整都有利于克服二十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秩序来讲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这些调整总的来说都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比如说凯恩斯主义政策，就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这样就使得失业率这一传统的约束工人的武器不那么有效了。福利国家减少工人再生产的风险也会鼓励工人对资本家进行斗争。资本劳动谅解也会使工人形成比较稳定的工资提升预期。这几个方面都有利于增强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再加上本来在战后初期，西方国家还有一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队伍，比如美国在大萧条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还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队伍在农业，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有 10%的劳动力队伍在农业。西欧农业劳动力比例

比这个还要高的多，但是到六十年代的时候原来的农业劳动力就吸收殆尽，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六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大家现在看到美国历史上平均利润率的图，这个利润率在 30 年代曾经大幅度下降。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来讲，利润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对于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危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简单地说，利润率上升和高涨的时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比如说美国六十年代的时候，利润率一度达到 20%。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利润率一直是趋于下降的。当时不仅是美国的利润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也是趋于下降，甚至是大幅度下降。这种利润率下降反映了西方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增长，并且给资本主义积累造成了严重困难。到了 1968 年，出现了世界革命高潮，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严重动摇，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几乎垮台，甚至在美国当时资产阶级上层也认为如果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很可能美国国内的安全秩序将无法保障。

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虽然世界革命高潮暂时过去了，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解决，因为工人阶级的力量仍然很强大，于是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局面。停滞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力量强大，能够不断地迫使资本家提高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又把因为工人工资提高带来的成本上升通过涨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就形成了价格和工资的循环上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手足无措，很高的通货膨胀伴随着很高的失业率，于是就叫做所谓的停滞膨胀。不仅对停滞膨胀的局面束手无策，本来在二战后，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都通过固定汇率联系起来的体系。比如美元和黄金的汇价固定在 35 美元兑 1 盎司黄金，然后美元又和其他国家的货币有相应的汇率。但是这个固定汇率体系到了 1971 年就坚持不下去了，美国没有那么多黄金兑换国外的美元，然后就改成了浮动汇率体系，布雷顿体系

崩溃。1980年前后，在最严重的时候，美元曾经跌到 800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如果按黄金来计算，美元大概贬值了二十多倍，美元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是很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被迫进行一些重大调整，表现在 1979 年撒切尔在英国上台，1980 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采取的经济政策，后来就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其中一个主要部分是货币主义政策，字面意义是通过紧缩货币供给控制通货膨胀，实际意义是紧缩货币供给大幅度提高利率，大幅度提高利率以后来主动制造经济危机，从而制造高失业率，破坏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以有利于资本家恢复利润率，这就是货币主义政策的实质。在英国私有化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英国的国有企业数量比较多，美国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所以不需要进行私有化，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减少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除了货币主义以外，英美资产阶级公开向工人阶级进攻，有两个著名的事件。一个是里根上台不久就挫败了联邦航空管制员的罢工，联邦航空管制员当时是联邦政府雇员，里根将原来的管制员全部解雇，然后用其他临时的、军队的管制员代替，这代表美国工人运动的一次挫败。另一个是英国 1984 年煤矿工人长达一年左右的罢工，抗议英国政府私有化和关闭煤矿的政策，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也以失败告终。

（有同学问：工人失业会导致消费不足啊，市场疲软怎么解决？）

这又和咱们传统学习的政治经济学不一样，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这个表述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是在二战以后，经常出现的甚至是典型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不是由于工人消费不足，而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减少了资本家的利润率。将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很可能也是这种形式。所以对于八十

年代的英美资产阶级来讲，他们首要关心的不是提高有效需求，而是破坏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恢复资本家的利润率，当然这种做法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有代价的。采取这些办法以后，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上半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有所恢复，但是没有决定性恢复，与六十年代中期还有差距。货币主义政策在短时期内可以给工人阶级以很大打击，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迫使工人接受减少工资。虽然消费不足不是主要矛盾，大量工人失业同时意味着一些资本家破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采取货币主义政策以后，还不能够决定性地破坏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旦资本积累恢复，工人阶级力量会很快恢复，资产阶级会被迫再次采取主动制造经济危机的政策。如此反复几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不断提高，会抛弃改良主义工会运动，会提出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事实上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遇到政治合法性的冲击，如果没有其他条件，这种局面拖下来。。。 （有同学问：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资本向大资本集中？）也不一定仅是小资产阶级破产。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轮到谁破产也不是那么肯定，比如当时美国几大航空公司都处于破产或破产边缘。那么，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最低限度西方资产阶级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严重的话还可能使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得到决定性提高，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

后来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样摆脱危机的呢？与此同时世界政治舞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人要回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要根本地摆脱阶级斗争的僵局。（有同学说：冷战结束）冷战结束远不是能救世界资本主义的。要有一种变化能够根本性改变西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和世界资本主义当时的危机当然有关系，但是苏联解体远远起不到根本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这些政策当然是资产阶级对于当时面临的危机做出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要达到期望的效果还需要其他的客观条件。那么通过单纯地短时期制造高失业，

不能达到根本改变世界范围阶级对比的效果。但是如果能够出现一个巨大的廉价的产业后备军，能够使得西方资本能够把利润率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产业转移出去，从而西方资本本身可以转移到利润率更高的产业。低利润率的行业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这样不仅能够使世界平均利润率提高，而且能够对西方工人产生威胁效应。如果说你不答应减少工资、增加劳动强度等条件，工厂就会搬到中国、墨西哥。但是威胁效应要起作用，潜在的劳动力越多越好。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起这个作用，其他地方不行？

上回讲到，中国通过不平等交换，每年损失的劳动净输出大概是美国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的劳动净收益的 1.5 倍。没有中国提供的对外劳动输出，有可能美国超额剩余价值就不能实现。中国提供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大到什么程度呢？90 年代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大概相当于全部经合组织（OECD）国家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总和。这么大一个劳动力队伍进入市场，而且是十分廉价的，具备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因为这个变化才解决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危机。六十年代中期，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从政治上来说，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动荡大概是从 1968 年持续到 1989 年；从经济上，1973 年持续到 1995 年都是危机和相对停滞时期。九十年代上半期，美国利润率开始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到 1997 年达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最高点，并且在以后的几个经济周期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水平。大概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才出现决定性恢复。大概从 1995 年以后，美国资产阶级媒体开始大肆宣传新经济，宣传新的网络、计算机技术革命。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克服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在八十年代以后会怎么样演变？中国是在七十年代开始和西方改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开始重新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分工，如果中国采取另外的选择，如果苏联在八十年代后期没有解体，这些情况如果不一样，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又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可以思考这些问题。

核心国家的危机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危机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主要部分是半外围国家的危机。当时的世界谁是半外围国家？放到二十世纪中期，首先是苏联，然后是拉丁美洲的几个大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然后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然后是几个主要的南欧国家，比如意大利、葡萄牙、希腊，东亚的日本。半外围危机的阶级矛盾可能会和中国即将进入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局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些半外围国家通过不同形式的社会变革，有的是通过革命，比如俄国，有的通过其他形势的内部变革，或者虽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其他形式的重大的革命，比如 1917 年墨西哥革命，通过这些变化，初步具备了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条件。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重大危机，特别是核心国家出现重大危机，这些半外围国家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当然受益的方式和时间点各有不同，比如苏联和拉美主要大国，它们的工业化基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期间起步的。大萧条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严重过剩，资本家大量抛售机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机器。抛售机器是核心国家在当时转移旧的产业的一种方式。比如苏联在三十年代初期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相当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致于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可以夸口说：虽然苏联劳动生产率还不够高，但是就新工厂里的工农业生产设备来讲苏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就是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出口受益的程度。

日本和南欧国家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利用当时新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比如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仆从国，利用这种有利的条件实现了经济起飞。日本是少有的从半外围国家跃进到核心国家的例子。二十世纪中期，苏联和拉美大国，成了当时的世界资本转移的受益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主要半外围国家都实现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苏联、拉美、东欧、南欧、日本。到了六十年代，苏联、几个拉美大国、南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开始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增强以后，他们有新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甚至要求比照西方国家的工人水平。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半外围国家依靠原有的资本转移所进行经济增长的潜力基本耗尽，也就是说它们处于既无法和核心国家在高技术上竞争又无法和外围国家在低劳动成本上竞争的窘迫的处境，使得半外围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焦点。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半外围国家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阶级斗争的事件。比如 1964 年巴西发生军事事变，推翻了有进步倾向、民主选举产生的古拉特政府。1969 年阿连德在智利当选总统，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民主选举获胜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 1973 年被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牺牲，皮诺切特上台以后在智利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智利工人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在经济上，大概在短短的几年里，智利的国民收入分配里面工资的份额从 40% 下降到 20%。葡萄牙到了六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仅剩的仍然企图维持庞大殖民帝国的国家，到了六十年代亚非大多数国家已经独立，但是在非洲，葡萄牙仍然保持着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几块殖民地，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抗，葡萄牙派出殖民军镇压。非洲人民在反抗过程中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领导人学习了大量的马列毛著作。在战争中，葡萄牙的殖民军连吃败仗，也接触了非洲人民解放运动的各种思想和马列著作，从而使得葡萄牙殖民军中下级军官的思想迅速激进

化，在葡萄牙军队中形成了武装力量运动。在 1974 年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据说各种颜色革命的起源就是这里。武装力量运动夺权后，葡萄牙共产党一度掌握政权。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1968 年有布拉格之春，1970 年波兰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造成流血事件，当时叫格但斯克事件。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东欧都处于震荡之中。波兰 1970 年的格但斯克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的波兰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下台。哥穆尔卡出身工人，年轻时是纺织工人，二战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多次被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被斯大林清洗掉。1943 年，波兰共产党重建，改名叫波兰工人党，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一直到战后的 1948 年，领导了波兰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战斗。因为与斯大林的分歧，哥穆尔卡先是被免职后来又被开除出党，1951-1954 年被抓进监狱。在 1956 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发生了流血事件。当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出现了去斯大林化时期。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的第一书记奥哈布把哥穆尔卡从监狱请出来。当时波兰内部十分动荡，赫鲁晓夫怕波兰脱离华沙条约阵营，所以派军队大军压境。赫鲁晓夫未经波兰政府允许突然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飞到华沙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谈判，奥哈布在未通知赫鲁晓夫的情况下请哥穆尔卡参加波兰谈判代表团，并且告诉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谈判的时候，波兰方面表示，如果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境内，波兰武装力量将进行抵抗。后来谈判还是缓和了，中国共产党起了一定的调解作用。哥穆尔卡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他开始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得到了波兰各界的拥护。哥穆尔卡执政期间，曾经是波兰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哥穆尔卡本人也十分简朴，长期住在工人公寓里。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波兰各种矛盾激化。格但斯克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波兰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波兰政府想要提高食品价格，结果触发了工人罢工。实质上，波兰不能一方面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另一方面满足工人的物质要求。哥穆尔

卡下台后，盖莱克担任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盖莱克年轻时在法国煤矿当工人，相对来讲受西方影响较多。盖莱克上台后采取了什么办法呢？现在觉得可能是很愚蠢的，在当时却是很受欢迎。又想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又想给工人涨工资，怎么办呢？借外债。那个时候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油价大幅度上升，各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叫石油美元。中东的君主国有石油美元又没有什么用，于是就存到西方银行，西方银行一度出现资本大量过剩的局面，于是纷纷鼓励东欧、拉美国家借外债，开始给的利率非常低。盖莱克的如意算盘是用低利率借外债，搞出口加工业，用出口的钱还债。这样又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又可以给工人涨工资，又可以有社会稳定，当时很多国家的逻辑都是这样。1979年，里根、撒切尔上台，西方资本主义遇到危机，开始采用货币主义政策。实际上美国的货币主义政策主要受害者是广大的半外围国家和非洲。1979年美国利率突然大幅度上升，从拉美到东欧的一大片地区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波兰1980年已经陷入困境了，波兰政府又想提高食品价格，于是不可避免地又引起了工人罢工，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有重大影响的团结工会运动。到了八十年代，东欧经济已经难以维持。苏联稍微好一些，七十年代苏联还可以靠石油出口维持一些局面，并且补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苏联石油产量也开始下降。1982年以后，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从而石油消费减少，另一方面，西方自己的产量也有所增加，一个是英国的北海油田，另一个是美国的阿拉斯加油田。就在油价开始下跌的时候，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合谋，油价下跌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继续增加石油产量从而使世界石油价格进一步暴跌（这个有一定野史的成分，但是也有一定的证据）。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苏联经济也撑不下去。接下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各国纷纷实行休克疗法。到了九十年代，各个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普遍受到重大挫败。从今天的环境

来讲，怎么理解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挫败？为什么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这些阶级斗争没有导致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半外围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资本积累以后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产生新的阶级力量，主要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当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以后，他们势必有更高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但是在半外围资本积累的空间里不可能承受这些要求。这个时候，势必意味着，要么是从根本上推翻资本积累体制，要么就必须重新确立资本积累条件，打破原有的社会安排。

半外围国家到了七十、八十年代，统治集团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一种方案是把原有工业消灭，顺便把原有的工人阶级摧毁，从而从半外围退步到外围，也就是半外围国家的外围化。这种方案不是不可以，但是劳动人民要付出代价，资产阶级也要付出代价。因为它意味着实际上是把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口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扔出去。包袱扔掉了，但是也不能被世界资本积累体系有效运用。半外围国家或者接近半外围国家地位的，走上外围化前途的，有许多中东国家，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都属于这种情况，东欧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乌克兰、高加索各共和国，中亚各共和国，基本上属于被外围化了，不再进入有效资本积累范围了。

再有一种情况，还是保留在半外围的条件下，但是进行彻底的产业结构的重组，重新找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位置。具体来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带动了对世界范围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得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俄罗斯，几个拉美大国主要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通过这样的调整，成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国。尤其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比较高的时候，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不仅能够保证资本积累，还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

维持国内的阶级妥协。这种妥协在拉丁美洲表现为所谓的左转，在俄罗斯表现为普京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东欧的几个无产阶级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可以被吸收进西欧为主的欧盟体系里面，成为欧盟体系里的半外围国家。

对于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说，一定意义上，最理想的情况是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但是在世界历史上，这是少有发生的。只有日本，利用了极其有利的战后政治和地理条件能够有这样的幸运，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

以上大概是半外围国家的克服资本积累危机的几种方案。除了这几种方案以外，有没有可能在半外围国家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造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呢？

在历史上，要在半外围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过渡，所遇到的困难与半外围国家在资本积累方面遇到的困难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方面，要能够充分满足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满足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还要在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的条件下维持一定的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这是原来的半外围资本积累体制没有解决的。如果是社会主义过渡，也是不容易解决的。比如说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它势必要进口一些核心国家的设备、技术、能源、原材料、劳动人民的消费品，所以有进口的需要，那么你能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有足够的出口来弥补进口。你既不能与核心国家在高技术上竞争，又不能和外围国家竞争血汗工厂，那么如何保持出口竞争力？这是一个难点。另外在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资本家经常采用的有力武器就是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要不要采取资本管制？如果采取资本管制，资本家即使不能把货币资本转移，资本家可以选择进行投资罢工。或者即使大规模进行没收资本家财产的行动，短时

间内工人阶级能不能代替资本家进行工厂和经济的管理？在经济混乱的过程中，城市小资产阶级还能不能保持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和同盟。智利社会主义过渡到后期就遇到了这些严重困难，智利后来发生军事政变，直接原因是军队支持了资产阶级，后面的更深的理由也包括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后期倒向资产阶级。再比如委内瑞拉，石油是主要工业，查韦斯执政初期，石油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是被与资产阶级密切联系的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就出现了石油业高级管理人员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罢工的局面。虽然后来在工人支持下努力恢复生产，但是没有恢复到查韦斯执政前的石油产量。这些都是半外围国家实际面临的困难。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也遇到类似的半外围危机的时候，也就是主流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进行比如说外围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保持半外围地位但调整结构、从半外围跃进核心，有没有可能按照三种方式里的任何一种来达成解决危机的条件？如果不能，那么中国工人就能首先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确保未来的危机不会按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与前面讲的半外围国家不同，今天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一定意义上也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轴心。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的阶级斗争，即使不说引起世界革命，也会造成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瘫痪，这可能会对未来中国的革命性变化造成有利的条件。第二点，也可能是更主要的方面，在二十世纪，各个国家的革命、社会变化都是为了寻找新的方式，重新确立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全然不同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世界资本积累已经与世界生态可持续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不仅是世界范围，在中国范围也是如此。所以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人类怎样由全社会对经济剩余进行控制，并且经济剩余不再用于资本积累，而是用于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

目的。怎么样从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过渡到将经济剩余用于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这个历史转变是我们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提问：

Q：就当前而言，怎么理解民族资本家的兴起？

A：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现在的条件来讲，民族资本家基本上不是一个有用的政治或经济概念。当然有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但是关系不是太大。

Q：未来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怎样的？

A：中国未来革命的对象应当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在具体的斗争中，肯定不可能同时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打击对象。根据条件不同，形势不同，对资本家的不同集团会有所区别，但是这是未来的具体问题。我们未来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不是历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

Q：怎么理解波兰团结工会的失败？

A：是在波兰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产生的，运动产生的初期应当说基本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曾经有一度有带有工人自治思想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但是很快也被排挤出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基本上落到了天主教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手中，瓦文萨只是头面人物。到了1989年前后，波兰发生了政治变化，波兰团结工会在形式上成为执政党，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失败是波兰工人阶级的失败，团结工会本身是“成功”的。

Q：波兰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

A：波兰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本质上和拉美的债务危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企图通过增加外债来克服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在美国大幅度提高利率以后，成为新自由主义调整和休克疗法的牺牲品。波兰到八十年代名义上还

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已经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波兰上层早已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念，无论是波兰上层还是团结工会，都是以资本主义复辟为目标的，仅仅是具体方式上有差别。

Q: 那在核心、半外围和外围的条件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有无可能联合来反抗资本主义？

A: 原则上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可能性以什么方式实现。目前来说，核心国家不太可能首先爆发革命。在真正的外围国家比如南亚、非洲也不太可能首先爆发革命。南亚虽然有比较活跃的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并且在一部分劳动群众里也有影响，但是要想取得根本的优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真正的未来阶级矛盾的重心会在半外围，尤其是中国。中国是资本主义体系分工的中心，如果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有可能打掉整个分工体系。核心国家剩余价值实际上大部分来自于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如果这个来源没了，无论是核心国家的还是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新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共同推翻资本主义的局面。

Q: Poland 的社会主义经济出现什么问题？

A: 波兰和拉美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在经历了一段城市化以后，工人阶级的要求增加了。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劳动成本上升了。这些半外围国家既不能在高技术上与核心国家竞争，也不能够用低成本方式跟外围国家竞争。所以出现积累危机，当时波兰企图通过增加外债方式解决危机，最终以悲剧结束。

Q: 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可以跑掉。

A: 人是可以跑掉，实际的物质的生产资料是带不走的。

Q: 怎么看南街村的发展模式？

A: 即使不谈南街村内部的阶级分化，南街村模式也是没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咱们未来要解决的是整个中国阶级结构的改变。

今天主要讲了历史上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斗争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在不同环境下如何重新确立对资本积累有利的条件。希望大家结合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思考一下：与中国现在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比较，尤其要考虑中国的阶级斗争未来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类似于历史上半外围国家危机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有什么策略？无产阶级可以有什么策略？只有咱们做到让资产阶级所有策略都失败，才能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Q: 工人阶级的落地敌人是谁？谁会留下来，如何斗争？

A: 基本上不要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一遇到危机就会逃跑。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包括整个的国家机器）是会与工人阶级一直斗争到最后的。当然在斗争过程中，力量对比会逐步发生变化，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会靠向工人，到了后期资产阶级也会瓦解。（有同学问：在工业区的资本家？）台湾资本家可以跑路，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如果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它可以有条不紊地把资本转移，把厂房搬走，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有同学问：资本家逃跑了，工人可以占领工厂）没有那么简单，资本家逃跑，工人就占领工厂。比如说富士康资本家逃跑，它需要的原材料是从国际市场来的，它所生产的产品有特定的市场和产业链，并不能简单地说资本家逃跑、工人占领工厂就可以了。我对工人阶级胜利的前途是有信心的，但是过程是长期和艰巨的。二十世纪后半期到现在的几种主要解决斗争的结局，西方核心国家是采取资本

转移的方式，但是并不是把原有的制造业拆了搬走，而是通过跨国投资和转包实现的。半外围国家中，比如说波兰、捷克、匈牙利是通过加入与地理上临近的核心国家组成的新的分工体系。俄罗斯、巴西原有工业大量摧毁以后，然后成为新的原材料、能源的供应国。

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2015年10月)

在现实的斗争中，我们长期要面临敌强我弱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国家机器和大众媒体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作为表面弱小的力量，我们如何从弱到强，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大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变化？一方面要靠我们的意识觉悟和阶级立场，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正确的对社会分析的方法，要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世界、人类社会和历史。要掌握对矛盾正确的分析方法，不要静态地、孤立地看待矛盾，而要将其视为动态的过程，考察矛盾的转换。

比如历史，毛主席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除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局面错综复杂，毛主席分析了日帝暂时强的原因，以及从长期地、持续起作用的因素来看，中国人民能反败为胜的原因。解放战争也是这样。我们要掌握矛盾的可能性和矛盾转化的规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认为一定的社会制度依托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是历史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分析社会制度时不仅要看到现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还需要找到本质的发展趋势、主要矛盾，然后了解在本质的发展趋势下历史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怎么变化，变化到怎样的阶段与原有社会制度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近代中国（即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的中国），始终面临着民族危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相当于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生产总值减少了到了世界的约百分之五。再看看中美比较：1820年前后，美国的人均GDP高于中国，美国与中国之比

约为 2:1，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扩大到了 20:1。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处于不断下降的地位。那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能否存在下去？首先要能打仗；要能打仗，就要有军事近代化；要有军事近代化，就要工业化、实现资本积累，就要把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剩余约为中国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农村（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15%，主要掌握在农村地主阶级手里，用于地主的挥霍消费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活动、仪式），三分之一来自城市（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10%，大概是三分之二在政府手里，2%-3%，用于生产性的投资。政府手里的很大一部分，自晚清以来，以赔款等形式转移到帝国主义手里，政府的维持主要来自借外债）。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之前，中国因为贸易逆差对外流失了 30 亿两海关银，海关银和当时美元的汇率大概是 4 两=3 美元，30 亿两海关银相当于当时 20 多亿美元。中国政府历年赔款的实际支付额约为 8 亿两，外债还本付息大概是 12 亿两，这样中国历年有 50 亿两海关银直接流到帝国主义手里。再加上外资在华投资的利润，历年约为 25 亿两，累计历年流出 75 亿两。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包括外债和直接投资），历年形成的外债约 13 亿两，直接投资约 12 亿两。那么中国历年累计是进 25 亿两，出 75 亿两，净流出 50 亿两。马关条约赔 2 亿两，是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约为当时日本 GDP 的三分之一；辛丑条约，清政府有 4 亿 5 千万两赔款。35 年来，中国给帝国主义国家输出高达 50 亿两海关银。清政府年收入 8 千万两；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是 12 亿法币，约为 5 亿多两海关银。1895-1930 年，中国累计输出 50 亿两海关银，相当于 25 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交给了帝国主义。城市经济剩余因此大量流出，被帝国主义掠夺。要实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就要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国家和经济秩序，用于资本积累和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面对的矛盾。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双重历史任务：1、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后，如何稳定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然后提高地位，即赶超西方的目标；2、新中国是人民大革命的产物，特别是农民革命的产物，新的国家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这是现实历史存在。1949年大革命之后，中国劳动群众有初步的革命觉醒，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与劳动群众还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都会对新中国社会关系有影响：1、经济剩余要集中在国家手里，党和政府就要号召工农劳动群众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做贡献，所以就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社会主义总路线等等，号召大家多生产、多劳动，这被当时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自觉接受。同时，为了尽可能加快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就要求劳动群众在一定时间内接受比较低的物质消费水平。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要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还有健康、养老等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3、这时候，经济剩余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里，虽然这个国家是革命的产物，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这个问题，即普通劳动群众其实缺乏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的权力，权力不能直接行使。怎么保证党和国家把这些经济剩余真正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当时的做法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和劳动群众同甘共苦，自觉限制物质特权，保证劳动人民贡献的经济剩余能真正用于长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4、除了现实的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长远的许诺：虽然我们眼前是艰苦奋斗，但长远会实现物质极大丰富，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实现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上面这些就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群众的社会契约。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在前三十年一直在起作用，但其实在一五期间已经遭到破坏：工业化过程中，需要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当时的文盲率较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人才主要来自地主和资本家家庭。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多是地主和资本家子弟。为了让这些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对这些人需要采取物质刺激的方式。新中国当时也留用大量国民党政府人员，还有大量资本家，前者是保留原职原薪，而资本家不仅可以继续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活动，1956年后新中国也采取极其优厚的赎买政策。新的共产党干部心理就很不平衡。1955年时就取消了供给制。战时采取供给制，后来被工资和薪金制代替，八级工资制，分成26个小级，每月560元最高一档，最低每月20元，这是城市国家干部。毛主席后来自己给自己降低几级，最高三档没有实行。到了1957年，中国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出身党员数量超过工人出身党员数量。1956年时，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党章做了一个结论：中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社会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仍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在国内外有重要含义。首先，这说明党和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那依靠谁？依靠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还有就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所以要给他们与贡献相适应的物质报酬。这是国内来讲，把正在形成的不平等社会和经济结构确认下来，隐含地开始抛弃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缩小不平等的承诺。国际来讲，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追求资本积累为目的，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定义主要任务是追求经济增长，放弃了革命的承诺，实际上就是按照世界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进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毛主席本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看作党内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所以搞双百运动，遭到党内上层官僚强烈抵制，以反右收场。后来大跃进，因官僚集团破坏付出惨烈代价。1962年，毛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当时中国、苏联两党大论战，实质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还要不要进行世界革命的问题。雅尔塔协定后，苏联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使命。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也是接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游戏规则，放弃历史使命。所以毛主席在中苏论战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变修的问题，四清运动

也被刘少奇所破坏。经过多次斗争尝试以后，党和国家一部分人已经变质，所以毛主席直接说“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中”。在各次党内斗争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毛主席希望直接号召工人和青年造反，进行继续革命。

1966年开始文革，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不足：首先，它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把资本主义复辟主要理解为旧社会遗留的旧思想、旧文化遗毒。文革高潮的时间大概是两到三年，1967年决战，1968年退却。已经形成的官僚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动员自己的子女，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所谓红卫兵，来镇压群众，转移斗争方向。这一步不灵，官僚集团初步混乱以后，就利用群众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来挑拨群众组织内斗，比如造反派和保守派。当时的武汉，有个叫“百万雄师”的保守派组织（里面主要是国营企业的正式工），对抗的造反派组织则主要是学生和临时工。两派斗得最严重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去武汉调停，支持造反派。武汉当时军方最高首脑陈再道，明知主席下榻东湖宾馆，但挑唆一大群不明真相群众冲击东湖宾馆，主席有可能在群众械斗的过程中遭到不测。周恩来就紧急调动海军军舰，把主席救出来，这就是七二〇事件，当时认为是反革命兵变，但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是形势进一步恶化，出现军队和地方官僚合作，挑动群众组织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是要不要给造反派发枪，同时要把文革引进军队，遭到军队将领强烈反对，毛主席不得已，先免去文革小组几个人的职务，不抓起来不可平军心。接着有军队“支左”，收缴群众的枪支，实际上镇压造反派。接着有三结合，但除了在上海，造反派掌权，其他地方基本没有造反派实质掌权。1969年，文革就处于全面退却的状态。

在世界范围来讲，1968年开始的世界革命高潮还在进行，但也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主席开始面临苏联在二十年代的问题，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世

界革命的问题。一五计划是成功的，但到了六十年代，由于自然灾害、走资派的破坏，文革的激烈，经济基本停滞不前。六十年代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好的时候，日本、南朝鲜都在这时经济起飞。那时，如果要长时期地抵抗美苏两霸和世界资本主义，那么人民就是要继续捱苦日子。当时是人均不到 300 公斤的粮食产量，一旦遇到灾害或战争，就很危险了。在国际上也要退却，新中国要把主要力量用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上来，就是要主动加入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1、回归苏东主导的分工体系；2、加入西方主导的分工体系。中共上层对这个问题有分歧，毛主席当时也邀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师做了形势分析，结论是：1、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可以专心进行经济建设；2、苏修其实比美帝更危险。林彪是反对参与西方分工体系的。但毛主席的决心是和西方缓和关系，所以后来有尼克松访华、与日本西德等国建交，到了 1973 年有四三计划，即 43 亿人民币外汇进口外国设备。这是中国自一五以后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因此重新回到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1973 年的十大，王洪文被认可接班人的地位。但到 1974 年邓小平复出，他实际上掌握全部党政军权力。这时形势对文革派很不利。当时城市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逐渐进入麻痹状态，虽然当时毛主席还在世，四人帮受到大多数官僚反对，在军队也没有根基。1976 年，毛主席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打倒邓小平。但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毛主席不同意，还是留了余地。同时，他把华国锋提拔。华代表的是文革期间一批地方干部的力量，属于中间派。毛主席对客观的力量对比，有清醒的认识，但力量对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变化。华国锋如有一定政治智慧，或可平衡党内左右力量。但华国锋有政治野心却很愚蠢，把左派当做主要的敌人。江青也不具有政治智慧，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最后，华国锋很快自己也被消灭。

走资派权力巩固以后，先在农村推行私有化。城市则是 1980 年代中期以前保持不变，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还是很大（“铁饭碗”等），虽然政治上麻痹了。当时的国营企业厂长经理还是对工人怕三分的，得看工人脸色。但旧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时也不起作用，对工人主要是多发奖金的办法。华国锋的洋跃进加快了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速度。八十年代，中国除了进口生产线，还大量进口了消费品和汽车。这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一部分是满足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是从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演变过来的，不同于 1949 年以前的“官僚资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收买小资产阶级，缓和与工人阶级的矛盾。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血汗工厂，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出口跟不上进口的增长，所以八十年代中国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国营企业的工人对生产过程中还有很大的控制能力，要求国营企业多发奖金。国营企业只好提高物价，这个压力转嫁到消费者，最后形成一个物价工资上涨的循环。城市小资产阶级方面，主要是知识分子集团。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恨死社会主义了。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限制了他们物质消费的特权；还有就是文革时，无论是官僚特权集团还是造反派，都把知识分子当成比较容易打击的对象；还有就是他们认为，作为外围国家的知识分子，无法进入核心国家职业技术人才劳动力市场，是很大的物质利益损失。邓小平在改开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讨好收买。当时城市小资产阶级对物质利益改善速度不满（没有很快超过工人阶级）。改开初期，为了否定毛时期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一定程度上利用知识分子搞所谓思想解放，也让小资产阶级产生幻想，不仅要在意识形态上占一席之地，同时还想和共产党分享权力。

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分三派：1、以陈云为首的“左派”，幻想搞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陈云也是修正主义，提出要搞鸟笼经济，即一方面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国家要控制制高点，但也要以发展国内市场为目

的，城市工人要有一定购买力。八十年代时，这个设想不具有实行的可能性。2、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的右派，坚定地要资本主义复辟。赵 1988 年见了弗里德曼，要实行价格一跳过河，要在短时期内放开所有价格，取消所有补贴，紧缩货币。3、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多数，是要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但是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如果和赵紫阳一样乱搞，会有被工人阶级推翻的危险。而且赵紫阳要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做较大让步，一方面会侵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邓认为，收买自由派知识分子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最终矛盾在 1989 年爆发。这个运动，我认为，一方面这不是官方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是自由派认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是某些左派认为的群众运动。它带有很明显的阶级性：运动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其中主要是城市自由派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虽然有参与，但他们没有政治自觉，当了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炮灰。

1989 年时，陈云和邓小平还是在平衡的状态（战术结盟）。但苏联解体彻底打掉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最后一点信心。1992 年邓在军队的保护下“南巡”，为改开造势。江泽民是陈云推荐的人选，也马上倒向了改开派。邓小平“南巡”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又为改开欢呼叫好，小资产阶级的右派倒向官僚资产阶级的一边。人民公社早已解体，八十年代后资本主义部门不断壮大，1992 年的工业部门，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已经各占半壁江山。依托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对城市工人阶级包围。这时，城市工人阶级经济上被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包围，政治上被孤立。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过程。中国资本主义因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繁荣中形成了新的阶级力量，而这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覆亡。下一次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

问：新中国建立后的双重历史任务：稳定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我不同意。而且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也不算孤立。

答：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危亡，实际含义就是能不能稳定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客观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制约（有没有能力打仗、在世界资本主义里面竞争）等等。如果中国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面的一部分，是哪个体系的一部分呢？苏联在美国大萧条之时进口大量技术，也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密切联系。

问：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与文革的关系，能不能再展开一下？

答：文革前后还是说官僚特权集团比较合适。官僚特权集团，没有形式上的私人占有。这一中国的特权集团在五十年代形成，六十年代已经相当巩固，毛主席想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反击官僚特权集团。根本的原因来说，因脑体分工，已经形成新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避免的。

问：造反派的内部分离，派别如何理解

答：工人阶级内部也有差别，正式工和临时工差别，工农的差别，知识分子的差别，等等。还有细小的群众利益差别。在没有有效革命组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斗争，能够坚持到底为人民群众的确实很少（包括王洪文，后期也有腐化）。而很小的矛盾，个人的私仇，也会在其中体现。这个问题在未来恐怕也很难完全避免。这是要经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复的搏斗，在无产阶级中能出现比较多的自觉积极分子，才能代表阶级而非少数人利益，服从于整个大局。

问：89年运动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马前卒认为是因为88年的大涨价。

答：我们要看清楚官僚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清阶级利益和在运动中的表现。自由派小资产阶级针对官僚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力。工人阶级没有政治自觉。结果九十年代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站在一起。

问：今天国内的左派不断的分离，是什么原因

答：今天中国的左派，属于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组成的。最后能不能靠近乃至变成真正革命者，是有疑问的。粗糙地来说，只要是来自小资产阶级，就会反映小资产阶级的特点。2012年以前，左派主要的群众基础有老左派、老工人、历史上的造反派积极分子、一部分边缘化的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本身的社会和历史来源就不同，各自思想形成过程也不一样，这是分裂原因之一。这些人和汪晖这种学院左派又不一样。近年来，青年左派团体，主要由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组成，没有经过重大斗争的考验，没有长期艰苦的实践，人的思想不会完全稳定。没有经过长期实践的考验，没有达到巩固的一致认识，思想分歧加个人性格差别等共同作用，难免形成分歧。未来，新工人的情况我们是否了解？知识分子怎么和工农结合？革命知识分子、改良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群众怎么协调关系？实践中有很多问题，从长远来讲，左派能不能团结，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能否团结，这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斗争中逐步解决。

问：我听说，右派比较团结，左派比较分裂，是对的吗？

答：我没觉得自由派比较团结。89的时候就不团结，先是王丹搞民主沙龙，后来被吾尔开希夺权了。广场的实际组织权力，则在柴玲的手里。右派知识分子在内部很多分歧，海外民运更是复杂。

问：要平衡世界革命和国内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矛盾是不是没法破，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应该还是发达的国家才能实现的，像中国这种积贫积弱的国家是不能实现的？

答：首先，发达国家（核心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原因是核心国家资产阶级从全世界剥削剩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本国工人较高消费水平从而妥协了。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确实少了，但由于中国的加入，使得这个局面能继续勉强维持。历史上，社会主义失败是不是必然？基本上是必然的，但不等于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上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历史的悖论是，彻底的土地革命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绝佳基础。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在生产关系全部释放以前，生产关系不会灭亡。二十世纪中期时，这个可能性还没耗尽，但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会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都在走向穷途末路。过去曾经束缚我们的各种条件，将不再起作用。

问：怎么看中国现在去剥削非洲人民？

答：中国资本家去剥削非洲人民是客观存在，但不是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主要部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个半外围国家，对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能用较少劳动交换较多劳动。但目前就整个体系来看，中国仍是要用较多劳动来交换较少劳动的。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贡献，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会遭受重大的破坏。在中国发生下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这个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怎么看现在的民族主义思潮？

答：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会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会引导小资产阶级支持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派。他们也会幻想民族国家地位提高，自己的利益也会因此有所提高。这影响到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

级。从长远来看，不必太看重这种思潮。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繁荣的结束，当资本主义没办法为小资产阶级提供这种幻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时，就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不管现在流行的思潮有多少种，只要不影响到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不断地给资产阶级增加困难，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临近危机，就不会影响我们的革命大局。

问：现在官方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中国梦，增强所谓凝聚力，转移国内矛盾？

答：（有同学说：只要不改变“血淋淋剥削”的现实）资产阶级的宣传，不能让工人放弃经济斗争。改变，要靠资本主义自己创造的矛盾，来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受教育。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我们今天讲中国革命的失败，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但主要的还是要了解到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如何变化，怎样可能为中国革命创造可能性。